



第 38 期（总 38 期）  
教学管理办公室编制

## 目 录

### ■ 新闻动态

“源流·首届高校学生文化遗产创意设计赛” 颁奖典礼在北京大学举行	4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乔杰入选首届“全国杰出科技人才”	5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关爱河北兴隆留守儿童六周年活动顺利举行	7
【教授茶座第 52 期】李沉简谈“挣脱枷锁，自由发展”	9
陈平原做客第十期“新青年·享阅读” 从《老北大的故事》体悟北大精神	11
“北京论坛（2016）· 伊斯兰堡” 隆重开幕	13
印度共和国总统普拉纳布· 慕克吉阁下访问北大并发表演讲	16
【“大学堂” 顶尖学者讲学计划】著名人类学家大卫· 帕金到北京大学讲学	20
技术与城市——经济学家、哈佛大学经济系爱德华· 格莱泽教授发表演讲	24
2016 中美大学智库论坛在北京大学举行	27

### ■ 网教之声

在线教育将如何影响印度	31
未来影响在线教育发展的十大关键性技术	33

### ■ 北大人物

刘意青：身逢沧桑意常青	36
胡军：探究学理 立己达人	43

### ■ 学者谈读书

李书磊：读书是一种生存方式 ----- 51

老舍：我的读书方法 ----- 52

### ■ 好文共赏

105岁杨绛逝世 “我们仨”终成绝响 ----- 54

### ■ 史苑钩沉

柳鸣九：《未名湖畔四年》 ----- 69

### ■ 大美北大

燕园盛夏 ----- 79

### ■ 学员心声

学习有感 ----- 81

## 编辑寄语

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杨绛先生于 2016 年 5 月 25 日凌晨一时十分逝世，“洗净这一百年沾染的污秽回家”，终年 105 岁。她生前曾表示：去世后，一、不开追悼会；二、不受奠仪；三、至多七八至亲送送。与辛亥革命同龄的杨绛先生出身名门，天赋文才，在文学上开辟了自己的一方天地，本期燕园网讯好文共赏选文回顾了这位世纪老人的一生。

主办：北京大学继续教育学院

承办：教学管理办公室

编委会组成：

主编：关海庭、张虹

副主编：杨虎、常靖

执行副主编：王凝、杨雯宇、吴晓风

编委会成员：肖志欣、曾玉芬、郑鹃、杨舒婷、刘晴晴、石传芬、唐海峰、孙叶敏、王帅、王迎春、王姗姗、林以晴、高前余、张翼、吴丹、王凯惠、徐燕、张凯、赵晓玲、白永花、司敏、李文文

## ■ 新闻动态

### “源流·首届高校学生文化遗产创意设计赛”

#### 颁奖典礼在北京大学举行

2016年6月11日晚，由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主办的“源流·首届高校学生文化遗产创意设计赛”颁奖典礼在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中庭举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杭侃，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李六三，四川省考古研究院院长高大伦，中央美术学院人文学院院长郑岩、副院长李军，北京大学学生工作部副部长陈征微，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徐天进，故宫博物院助理馆员叶祎珮，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副教授王子源，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艺术总监勾霞，深圳金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吴强华等专家学者、大赛评委出席典礼。

当晚，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以往清寂的中庭变身为夜间“咖啡馆”，整场颁奖典礼以“设计分享”“文创讲坛”“大赛颁奖”等形式展开。杭侃在致辞中肯定了本次比赛的重要意义，回顾了“源流运动”的发展历程，并向莅

临活动的专家学者、评委嘉宾表示热烈欢迎。

在设计分享环节，大赛一、二等奖及部分三等奖获得者讲述了他们的灵感和创意，与会嘉宾为获奖选手颁奖。

在文创讲坛环节，嘉宾们围绕“什么是中国设计”“文化遗产作为一种资源该如何运用？”“从设计到推广有多少路要走？”“国外有哪些经验可以借鉴”等议题展开，分享了他们对于中国文创的思考。



文创讲坛现场

6月11日是中国第11个文化遗产日，今年的主题是“让文化遗产融入现

代生活”，与本届大赛的主旨相得益彰。本届大赛以“古典的要素”为主题，参赛作品需要建立在对古代文化遗产的深入分析上，以提炼其精髓，将在当代更有生命力的要素与现代设计结合，以创作出联结过去与未来的优秀作品。大赛分概念设计和产品设计两组征集作品，历经征稿、初评、终评等环节，历时7个月，最终由专家评委评选出各组别一等奖1名，二等奖4名，三等奖10名（其中产品设计因投稿比例较大，三等奖增至15名），并由公众投票选出“最受欢

迎作品”。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徐天进谈及本次大赛的活动主题时说道，“源流”的这次活动，将源远流长的考古文明带入现代生活语境，追溯源头，又将其延续至今。拉近考古与当下生活的关系是本次活动最大的意义所在。参展选手用极具创意的方式，通过当代的传播渠道和技术辅助，打破了传统意义上考古给人们留下的腐旧印象，让考古焕然一新。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江南

##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乔杰入选首届“全国杰出科技人才”

2016年5月30日，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中国科学院第十八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十三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6月2日，颁奖典礼举行。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生殖医学学科带头人乔杰教授入选第七届“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并作为临床医学界代表入选首届“全国杰出科技人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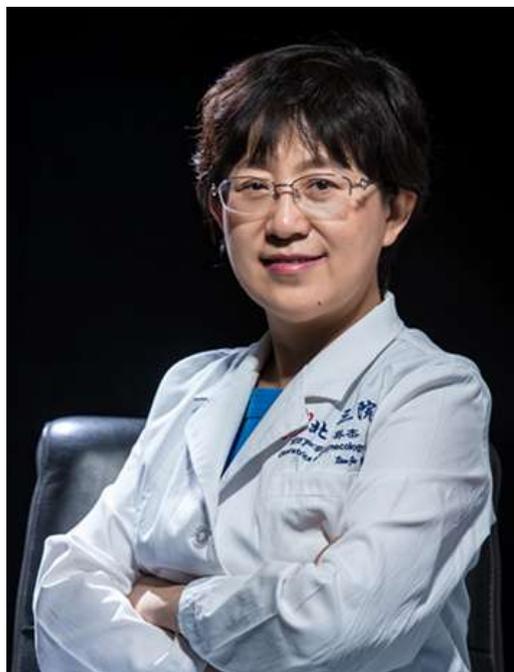
颁奖现场

乔杰从事妇产科及生殖医学领域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29年，致力于妇产科及生殖医学相关的临床与基础研究，在我国生殖医学这一新兴领域，不断提

出临床亟待解决的问题，并在基础研究向临床转化的研究领域不断进行着开拓性工作。其带领团队建立的生殖医学中心为目前世界规模最大、治疗方法最全面的生殖医学中心之一。中心年门诊量50余万例，辅助生殖技术手术两万余例，已为数十万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疑难不孕症患者提供了成功的治疗。

作为活跃在我国生殖医学临床一线工作的领军人物，乔杰完成了大量基础与临床相结合和转化研究，并取得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成绩：关注女性生殖健康，在国内率先建立以最常见妇科内分泌疾病——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为代表的生殖健康研究队列，发现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发病炎症机制，制定适用于中国PCOS的诊断标准等；发现炎症因子影响卵母细胞质量导致不孕新机制，改进卵母细胞及胚胎冻存技术，显著提高妊娠成功率；世界上首先将MALBAC扩增高通量测序技术应用于单个卵母细胞全基因测序技术，深入研究人类配子及胚胎发育规律，利用微量细胞或单细胞DNA甲基化组测序技术在国际上首次解析了人类早期胚胎发育过程DNA甲基化调控网络，并已经成功进行临床转化，帮助有遗传疾病的家庭获得健康后代，标志

着中国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技术已处于世界领先水平。



乔杰近照

“生殖医学具有研究与临床紧密结合的鲜明特征。‘患者至上’的更高境界是‘人类健康至上’。在科研方向选择和临床重心选择上，我们应该更多融入这一理念。”乔杰汲取着各领域科研成果，组织各方力量，在生殖医学领域不断探索。

据悉，为助力科技工作者成长成才，探索具有广泛公信力和社会影响力的科技界社会奖励，调动激发科技工作者创造活力和潜能，中央批准在“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奖中增设“全国杰出科技人才”子奖项。“全国杰出科技人才”

奖主要是表彰奖励在承担重大科研项目、重大工程以及前沿、重点学科领域取得原创性、标志性重大成果，在促进国家科技事业发展中作出重大贡献，在国际学术同行中认可度高，在科技创新中活跃在科研一线的高层次科技领军人才。

今年，经推荐、资格审查、评审委员会评审及社会公示等程序，在 494 名第七届“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范围内

产生了有效候选人 80 名，最终 10 名入选“全国杰出科技人才”。这 10 名获奖者涵盖了物理、化学、生命、农业、医学、地球、信息、材料、工程科学等学科领域，乔杰教授为临床医学领域唯一代表。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白杨

##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关爱河北兴隆留守儿童六周年活动顺利举行

2016 年 5 月 30 日上午 10 点，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青年志愿者协会在北京大学老地学楼 128 会议厅成功举办“雾灵情·北大爱”关爱河北留守儿童六周年活动。河北省兴隆县留守儿童学校校长赵占国带领 22 位优秀学生代表来到北京大学，与环境学院师生们共庆六一。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唐孝炎，北大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邵敏、党委副书记刘卉，张世秋教授、温东辉教授、刘建国教授、韩凌教授以及学院团委书记卢国栋、工会副主席占子玉等出席此次活动。



师生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正门合影

兴隆县留守儿童实验学校与北大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至今有六年情谊，六年来，学院多位教师长期捐助学校里的贫困学生金额已经接近 20 万元左右。值此活动之际，很多老师特意来看望自己资助的孩子。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唐孝炎院士也很早就赶来与她捐助的孩子进

进行交流慰问，唐孝炎对孩子们的关切之情溢于言表。活动开始，张世秋代表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师作了精彩发言，启发孩子们关注身边环境。之后赵占国发言，带领孩子们一同向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师们表示由衷感谢。留守儿童学校的孩子们也精心准备了歌舞表演，表达了他们的感谢与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学院老师为优秀学生颁发北大小红花证书，孩子们为老师们佩戴红领巾，证书与红领巾的互赠蕴含着老师与孩子之间的浓浓情谊。刘建国为留守儿童学校颁发“爱心餐款”，刘卉代表学院老师赠与留守儿童学校两万两千元“爱心午餐”支票。学生代表贾长泳同学在发言中表达了感谢之情和一定努力学习的志向，孩子稚嫩的声音中有坚定的决心，孩子们的成长令所有人感到欣慰。最后，北大环院和雾灵山留守儿童学校双方互赠锦旗，至此活动圆满落幕。



唐孝炎院士亲切慰问受资助孩童



学院教师为优秀学生颁奖

活动结束后，青年志愿者协会的学生志愿者带领孩子们游览北大校园，让孩子们接受北大旖旎的自然风光和浓厚的人文气息的熏陶，鼓励孩子们努力学习，为自己创造一个更光明的未来。下午，志愿者带领孩子们前往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参观，陪伴孩子们度过了开心而有意义的一天。



游览燕园未名湖

六年来，无论阳光风雨，北大环院伸出的大手始终紧紧牵握着雾灵山留守儿童稚嫩的小手，与他们分享欢笑，带他们走过风雨，用爱心化作暖阳去点亮他们的人生。今后，帮扶活动仍将继续，

北大环院希望可以为更多留守儿童带来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山石



资助教师代表张世秋老师发言

## 【教授茶座第 52 期】李沉简谈“挣脱枷锁，自由发展”

2016 年 5 月 12 日下午，北京大学教务长、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李沉简教授做客第 52 期“教授茶座”。李沉简针对大学生选择、发展与成长的问题，与大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并分享了自己的人生经验与感悟。经济学院 2015 级本科生秦雨慧担任主持人。



活动现场

李沉简首先简要阐述了他对主题的一些理解：“一个人在成长发展的过程当中，

可能受到很多枷锁的束缚。这些枷锁既包括外在的环境，也包括内在的各种各样的心魔——担心、恐惧和杂念。只有将这些‘枷锁’看得清楚透彻，彻底挣脱它们，才能够真正实现自由发展。”

有的同学对于自己目前就读的专业和未来的职业选择感到迷茫，不知道自己真正喜欢什么，李沉简开导说：“有的人找到一个让自己爱得天荒地老的事业，那是非常幸福的。但是真正对某个事业爱得疯狂、非此不可的人其实很少。更多的人比较灵活，做好几样工作都还不错——这样的人随遇而安，又何尝不是一种财富、一种解脱呢？重要的是发现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真的对什么热爱。”他进一步指出，教育的根本，是

帮助每一个优秀的人才成才，而且真的找到他人一生中快乐的、值得做的、这辈子真想做的事情。

有同学对于如何做出决策感到疑惑，李沉简解答道：“中国有句古话叫‘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做决策的时候，首先，要大量搜集数据信息，不要拒绝、不要偷懒，更不要莽撞行事；其次，在充分掌握信息的基础上一定要简化你的优化指标，你所考虑的最核心因素不能超过两个，之后果断决策。优化指标太多了，一定导致患得患失。”



李沉简教授和学生们交流

李沉简还幽默地告诉大家，他信奉两条“李沉简定律”，第一条是“鱼与熊掌定律”：“世上大多数的东西，多做一点点努力，鱼与熊掌是可以兼得的。比如，事业成功和家庭美满，专业专精和知识广博，坚持原则和宽厚仁爱，民主作风和高效果敢等等。”第二条是“10%定律”：“在任何领域，做到前 20%就会有饭吃，

做到前 10%就有很好的饭吃。”他还鼓励同学们：“能来到北大说明大家是前 1%，所以完全不必为生存焦虑。”

李沉简妙语连珠，茶座现场总是笑声阵阵。他与同学们一起喝茶聊天，时而站起身走到白板前写下几个字或画个草图，帮助大家领会他要表达的意思。交流气氛热烈、融洽，原计划 2 个小时的茶座不知不觉地延长到了近 3 个半小时，直到结束，大家还都意犹未尽。最后，李沉简挥笔写下对同学们的寄语：

“兴致勃勃地过日神酒神合一的生活。”

教授茶座是学生工作部于 2014 年 3 月推出的一项师生交流活动。活动希望创新教育形式，搭建师生沟通的桥梁，倡导在轻松自由的氛围中不谈学术，只谈人生，让老师更加了解学生所思所想，同时以老师的人生经历、人格魅力影响学生，实现思想的碰撞和情感交融。教授茶座每周举办一期，每期都有不同的教授带来不同的故事，给学生带来不一样的心灵滋养。“燕园学子微助手”微信平台为学生提供教授茶座的活动通知和报名通道，并分享教授茶座微语录。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山石

## 陈平原做客第十期“新青年·享阅读”

### 从《老北大的故事》体悟北大精神

5月19日下午，第十期“新青年·享阅读”读书沙龙活动在图书馆举办。时值118周年校庆，新青年网络文化工作室特别邀请中文系陈平原教授担纲本期“领读导师”，师生共同阅读《老北大的故事》一书，鉴往知来，在体悟北大精神与北大传统的过程中，坚定青年一代作为“网络原住民”特殊身份的成长志向。

较以往的九期，本期读书沙龙还在组织形式方面进行革新。活动围绕市委教育工委“读书读经典”系列活动推进要求，与校友企业合作，借助“云舒写”平台的支持，在原有“线下讨论”之前，通过“受邀进入”的方式，增加了“线上讨论”的互动性和趣味性，此外沙龙现场视频音频资源也将进一步转化利用，最大限度实现读书资源的共享，促进青年群体的自育自新。



陈平原领读《老北大的故事》

读书沙龙分为导师领读、自由提问、自由讨论等三个环节。在领读环节中，陈平原首先介绍了《老北大的故事》的写作背景，指出这本书的出版与北大校庆日的确立关系密切，并在随后对北大建校的历史进行了回顾。他提出，大学的历史不在于长度而在于厚度，盲目地上溯历史是无谓的，将北大成立的时间定格在1898年具有充分的理据。陈平原特别提到校训与北大精神的问题，指出北大虽没有正式确立校训，但蔡元培校长“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治校理念是历久弥新的，“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也不只是一句口号，还具有丰富的时代性内涵。

自由提问和自由讨论环节中，来自不同院系不同学科背景的同学就阅读和领读导师讲解中产生的疑惑进行争鸣。一位阅读生提出北大人才培养目标的问题，引发在场同学共鸣。对此，陈平原回应指出育人是大学教育根本使命，北大为所有同学提供了一个巨大的平台，这个平台蕴藏着无限的可能，每个人需要找准自己的方向，坚定选择，同时对于个体间的差异性也应该心怀尊重。针对教育学院学生提出的身份转换问题，陈平原表示未来将把自己擅长的专业性研究和大学通识教育相结合，一方面为文学专业教育拓展思路，另一方面也为学校改革发展提出更多建设性意见。其后，阅读生还提出了许多关心问题，陈平原一一耐心予以回复，提问与讨论过程中师生的积极互动，使得交流读书心得、启迪问题思考的活动立意不断凸显。



领读导师与阅读生合影

针对网络时代普遍存在、师生共感的快餐式、碎片化阅读问题，2015年4月第20个“世界读书日”前夕，新青年网络文化工作室正式推出“新青年·享阅读”读书沙龙活动，并面向全校学生开放，以经典阅读和师生共享的方式来整合时空变化中的教育传统和教育变革。一年来，邱泽奇、张帆、平新乔、燕继荣、张亚光、王红生、张新刚等深受学生喜爱的老师先后做客活动，在青年群体中有力推广了“深度纸质阅读”的学习方式和思考方式，并逐步带动校园中更多读书活动的兴起。2016年5月，学校正式向北京市推荐“新青年·享阅读”读书沙龙活动，为北大读书活动的精品项目。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拉丁

## “北京论坛（2016）·伊斯兰堡”隆重开幕

当地时间 2016 年 5 月 24 日下午，北京论坛首届海外分论坛“北京论坛（2016）·伊斯兰堡”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正式开幕。此次海外分论坛应巴基斯坦驻华使馆和巴基斯坦国立科技大学邀请，由北京大学、巴基斯坦国立科技大学、丝路文化发展联合会、巴基斯坦高等教育委员会共同举办。来自中国和巴基斯坦的知名专家学者将会就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问题在接下来的两天展开对话，共同回顾中巴两国建交以来走过的 65 年辉煌历程，展望人类命运共同体下中巴关系发展的新方向和新契机。

巴基斯坦总统马姆努恩·侯赛因（Mamnoon Hussain）、巴基斯坦高等教育委员会主席穆赫塔尔·艾哈迈德（Mukhtar Ahmed）、巴基斯坦现任驻华大使马苏德·哈立德（Masood Khalid）、巴基斯坦中将参谋长兼巴基斯坦国立科技大学校长穆罕默德·阿格哈尔（Muhammad Asghar），以及对中巴经济、政治、文化关系研究颇有建树的 50 余位外方代表及中国驻巴大使孙卫东，丝路文化发展联合会会长耿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朱善璐，北京大学荣誉教授、香港城市大学前校长张信刚，北

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庆国，北京大学巴基斯坦研究中心主任唐孟生，北京大学人口所所长郑晓瑛，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段晴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武常歧，北京大学国际传播战略研究院院长程曼丽，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以及来自北京大学、上海国际关系研究所、国防大学、四川大学南亚研究中心等多家学术机构的 40 多位中方代表出席了论坛开幕式。



马姆努恩·侯赛因和朱善璐出席开幕式

### 共叙中巴友谊，加强文明对话

此次海外分论坛以“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中国与巴基斯坦”为主题，秉持北京论坛“推动亚太地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促进亚洲、太平洋地区乃至世界的学术发展和社会进步，进而为全人类的发展与繁荣作出贡献”的宗旨，围绕中巴两

国的过去、现实与未来展开全面探讨。中巴两国同处亚洲政治文化中心，交往历史悠久、关系密切；建交以来，在全球化的政治经济格局下，两国在维护亚太地区安全稳定、打击恐怖主义方面，有着广泛的战略利益，两国关系平稳发展；“一带一路”和“中巴经济走廊”等国家战略提出后，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命运更加紧密相连。加强两国间的文明对话，对于共同传播东方智慧、弘扬亚洲价值有重要帮助。本次论坛的召开是中方对加强两国人文交流承诺的落实，是两国人文交流的重要成果，也是两国对实现“新文明观”美好愿景的共同推动。

### 顺应多元文化，持续互鉴互进

论坛于5月24日下午在巴基斯坦国立科技大学开幕。巴基斯坦国立科技大学顾问、巴基斯坦国立科技大学智库主席阿梅尔·哈什米（Amer Hashmi）和北京大学李岩松副校长致欢迎辞。马姆努恩·侯赛因、穆赫塔尔·艾哈迈德、孙卫东、朱善璐以及穆罕默德·阿格哈尔在开幕式上发表了主旨演讲。他们分别从不同角度出發，回顾了古老的巴基斯坦文明以及中巴友好交流的佳话，强调了开展人文交流和对话的必要性，指出了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客观现实，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文

化的优质方面，应借着经济全球化大潮而多元发展，在历史长河中持续交融，才是未来世界文化形成的唯一途径，也是各国在二十一世纪文化建设中应具备的文化自觉。

马姆努恩·侯赛因首先对中方代表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侯赛因认为巴基斯坦成为北京论坛首次海外举办地具有非常深刻的意义，中巴关系是世界双边关系的典范，希望此次论坛的顺利召开能更好地促进双边关系的发展。



马姆努恩·侯赛因致辞

朱善璐在致辞中提道：“我们不应以文明冲突论的角度来看文明，文明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客观现实。文明之间没有高下之分，应该彼此尊重、相互学习，这是文明交流对话的根本前提。文明共同体需要不同文明之间进行沟通与互动，中巴两国应该把良好政治关系转化为人文交流的动力，打造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友好合作的样板。北京大学将

以此次伊斯兰堡论坛为起点，推进中巴高校更进一步的合作与发展。”



朱善璐致辞



穆罕默德·阿格哈尔致辞

### 深入交流对话，探索发展之路

在持续三天的论坛中，两国学者将就中巴区域关系、文化、外交、建设和发展等问题展开深入对话，回溯两国友好往来历史的“中国文化与丝绸之路”，探讨中巴深入合作的“丝绸之路与中巴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与城乡人口统计学的重要意义”“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巴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交通、基础设施、后勤建设对‘中巴经济走廊’的支持”，

以及关注全球和谐与共同发展的“为了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中国的视角”“中国 and 世界经济”等议题。通过全体大会、小组讨论、圆桌会议等多种形式，中巴两国学者专家将发挥个人研究专长，为文明间的交流和共同发展与繁荣积极建言献策。



侯赛因与朱善璐共同见证《中国和巴基斯坦，真诚的朋友》新书发布

开幕式最后，中巴领导共同见证了《中国和巴基斯坦，真诚的朋友》新书发布。



中巴与会嘉宾合影

2016 年恰逢中巴建交 65 周年以及“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实施的关键之年。



这次海外分论坛是北京论坛创立 12 年来首次在异国和异地举办，也是北京论坛主动走向海外，和其他文明开展对话的一次重要尝试。在中巴两国学者们的共同努力下，此次北京论坛海外分论坛将为纪念中巴建交 65 周年和“一带一路”倡议实施贡献力量，为推动东北亚与南亚之间的经济互惠、政治互信、人文互动以及学术繁荣注入新动能。

### 附：北京论坛介绍

北京论坛是经中国国务院和教育部批准，在北京市政府的指导与支持下，由北京大学、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联合主办的国际性学术会议，自 2004 年开始每年举办一次。2016 年 5 月将举办第一届北京论坛海外分论坛。北京

论坛的宗旨是通过推动亚太地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研究，促进亚洲、太平洋地区乃至世界的学术发展和社会进步，进而为全人类的发展与繁荣做出贡献。

北京论坛是以倡导文明和谐为中心的国际性学术论坛。论坛以北京雄厚的文化底蕴为依托，在介绍和发表世界高水平学术成果的同时，借鉴并吸收世界范围内的高水平研究成果，推动亚太地区的学术发展，凝聚世界范围的研究力量。经过十余年成长，北京论坛已发展成为世界范围内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高水准的学术论坛。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白杨

## 印度共和国总统普拉纳布·慕克吉阁下访问北大

### 并发表演讲

2016 年 5 月 26 日上午，印度共和国总统普拉纳布·慕克吉阁下率团访问北京大学，与校长林建华进行了会谈，并在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厅发表了题为“印中关系：加强民间合作的八个步骤”的演讲。此外，他也参加了当天上午在北大举办的中印大学校长圆桌会议。慕克吉总统此行是应习近平主席之邀，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的。

上午 10:00，慕克吉总统车队一行抵达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等在中心门口迎接。在众人的陪伴下，慕克吉总统及印方人员首先向英杰交流中心南侧广场上的泰戈尔铜像敬献了花环。泰戈尔是中印两国家喻户晓的人物，在中印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这尊泰戈尔像是

由印度原总统纳拉亚南于 2000 年来校访问时，赠送给北京大学的。

在与林建华进行亲切会谈后，慕克吉总统的演讲会于 10:50 在英杰交流中心阳光厅举行，袁贵仁、刘振民，以及来自印度政府、印度驻华大使馆、中国教育部、中国外交部和中印高校的嘉宾出席了演讲会。北大师生及校外媒体记者 400 多人聆听了慕克吉总统的演讲。演讲会由北大副校长高松主持。

林建华在欢迎辞中对慕克吉总统一行以及各位嘉宾朋友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说，慕克吉总统在 2008 年 6 月时任印度外交部长时曾访问北京大学并在此发表演讲，提出印中两国应共同致力于亚洲及更广阔领域和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安全，北大师生记忆犹新，今天大家又欢聚一堂，再次聆听慕克吉总统的演讲。



林建华致欢迎辞

林建华表示，北京大学致力于推动中印两国的人文交流，始终高度重视发展与印度高等教育界的合作。今年是北京大学创办东

方学科 70 周年，70 年来，以季羨林、金克木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北大学者在印度学、佛学、中印文化交流史和印度近代文学等领域开展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极大地增进了中国乃至世界对印度文化的了解。中印两国学者和青年学子来往频繁、感情深厚。1947 年，印度著名汉学家师觉月（Bagchi）先生就来到北大讲学，为北大的印地语学科发展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而北大也培养了一大批印度的学者。2003 年 6 月，来华访问的时任印度总理瓦杰帕伊为北京大学印度研究中心揭牌。十几年来，中心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深化中印学者合作方面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北京大学正在和印度那烂陀大学共建的玄奘亚太研究中心又是一个新的里程碑，将是对玄奘精神的传承。

林建华最后表示，纳拉亚南总统、卡拉姆总统、拉奥总理等多位印度共和国领导人也曾先后访问北京大学，在燕园留下了足迹。这是两千年来中印文化交流事业在当代的延伸。他希望中印的年轻一代通过更多的交流，拥有更广阔的视野、更宽广的胸怀，播下更多中印两国人民友谊的种子，为两国的文化交流事业作出贡献。

慕克吉总统随后以“印中关系：加强民间合作的八个步骤”为题发表了演讲。慕克吉总统首先回顾了印中两国人民交往的历史。他表示非常荣幸来到北京大学，因为这

所著名的高等学府在其辉煌的发展历程中，接待了来访的国际学者，并与邻国以及其他国家的机构保持着密切联系，对印中思想家之间丰富的学术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享誉世界的印度诗人泰戈尔和中国知识分子关于“亚洲复兴”的对话就是这种宝贵交流的一个高潮。



慕克吉总统作演讲

他说，印度和中国自第一个千年就存在广泛的知识和文化联系，两国都继承了这一伟大遗产。若是没有鸠摩罗什或菩提达摩的重要贡献或者中国的玄奘和法显的记录和经历，印中之间的共同历史是无法想象的。随着两国人民对文化遗产的研究继承，两国的民间关系日益密切。进入上世纪初期，印度和中国都在努力摆脱外国控制并恢复其世界秩序中的应有位置，两国人民相互汲取力量和相互激励。印度人民深情怀念中国领导人对印度自由运动给予的坚定支持。同样，印度医生柯棣华带领的援华医疗队是两

国人民真挚友谊的见证。印度在 1950 年 4 月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之后两国关系变得更加广泛和多样化。今天，印度和中国在追求各自发展目标的同时，也在努力实现睦邻友好和“亚洲世纪”的共同梦想。

慕克吉总统认为，印中两国作为新兴经济体，是世界和地区繁荣与稳定的重要力量。两个国家应携手合作，共同努力，加强沟通，相互尊重，相互信任，重点推动以人为本的合作关系。对此，他具体提出了八条措施：加强政治沟通，求同存异，加强两国政府间的沟通和联系；为两国年轻人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和文化交流机会；在数字时代，在影视传媒领域加强合作，塑造人民对两国关系的正面认识；重视两国的文化遗产，围绕印度的瑜伽、中国的太极以及两国的传统医学等重点增进合作；促进旅游业发展，以此作为加强联系的纽带；在解决诸如环境恶化、数字鸿沟等问题方面分享经验；通过 G20、东亚峰会、金砖四国、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国际组织和会议平台，加强对全球和发展问题的应对；最后，发掘两国在双边贸易和投资领域的潜力，印度将邀请中国企业参与“印度制造”和“创业印度”计划，共同创造新的商业模式。

慕克吉总统表示，他相信随着印中两国不断扩大和加强双边合作，定能造福两国人民。最后他以圣雄甘地 1942 年说过的一句

话“我期盼有一天，自由的印度和自由的中国像朋友和兄弟一般，为着自身、亚洲以及世界的福祉携手共进。”来呼吁印中两国人民为实现这一目标不懈努力。

演讲会后，慕克吉总统与林建华校长互赠礼物。总统阁下为北京大学图书馆准备了350本梵语和孟加拉语书籍，这些书籍涉及印度文学、文化、瑜伽以及泰戈尔先生的生平。北京大学赠送给慕克吉总统的是北大学者在中印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包括季羨林先生全集。

演讲会结束后，慕克吉总统还出席了在英杰交流中心月光厅召开的中印大学校长圆桌会议。来自20所中印高校（包括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12所中国大学，与德里印度理工学院、那烂陀大学等8所印度大学）的校长及代表参会，并针对“科研：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学科”以及“教育：促进创新与创业分论坛”两个分议题开展讨论。林建华围绕科研议题作了主旨演讲，他总结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和北京大学的现状，开启了中印双方大学校长对于高等教育的热议讨论。德里印度理工学院董拉姆戈帕尔教授就世界一流大学应具有的特点和素质以及世界一流学术机构的实现途径作了详细阐述。印度那烂陀大学名誉校长杨荣文先生也回顾了中印两国交往源远流长

的历史，并表示了对中印两国教育科技领域加强未来合作的期待。



中印大学校长圆桌会议现场

在圆桌会议临近结束时，慕克吉总统与袁贵仁部长共同见证了包括北京大学与那烂陀大学在内的16所中印大学交换合作协议的签署。慕克吉总统还向与会的中印大学校长发表演讲，希望通过中印两国高校加强民间合作、促进相互理解与交流。会后，慕克吉总统、袁贵仁部长与北大印地语专业师生合影留念。（文/新闻网记者 张宁）



慕克吉总统与中印大学校长合影留念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安宁

## 【“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

### 著名人类学家大卫·帕金到北京大学讲学

应北京大学“大学堂”顶尖学者讲学计划的邀请，著名人类学家、牛津大学万灵学院院士大卫·帕金（David Parkin）教授于2016年5月10日-25日到北京大学讲学。北京大学国际合作部、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以及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联合承办此次讲学活动，光华教育基金会提供资助。

5月12日下午，北京大学副校长李岩松在临湖轩会见了大卫·帕金教授。帕金教授此次来访，是继1998年应费孝通教授之邀，参与北京大学百年校庆“国际人类学系列讲演”活动之后，时隔18年再次到访北京大学。李岩松对帕金教授的到访表示欢迎，并向他颁发了“大学堂”顶尖学者铜牌及证书。北大社会学系教授渠敬东、王铭铭陪同会见。



李岩松向大卫·帕金颁发“大学堂”顶尖学者纪念证书

帕金教授此次北大讲学活动包括四场系列演讲及一次圆桌讨论。5月14日下午，题为“人类学：全球沟通中的人道主义声音”的首场演讲在第二体育馆地下报告厅举行，哲学系教授吴飞担任评议，王铭铭主持。演讲中，帕金从全球沟通、人道主义与人类学这三个目前与整个世界未来发展产生密切关联的研究领域入手，阐述了当前超级多元（super-diversity）时代社会科学所面临的新挑战，以及人类学在应对上述挑战时所具有的理论潜力。所谓“超级多元”的概念，帕金借用自德国马普研究所所长史蒂夫·韦尔托韦茨（Steven Vertovec）的概念，指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发展所呈现的一种新的时代特征。在这样一个时代，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的社群杂居于超级城市（mega-city）中，这些流动的新移民带来了宗教的、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多样性。超级城市的政治文化影响力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民族国家”，这将引发社会科学界反思以边界或边疆概念对民族国家进行研究的诸范式。在“民族国家”的单一范式下，政治一体

性与文化多样性被视为重要的对应，而“超级多元”则试图打开社会科学研究的可能性，推动“人”及“社区”的研究走向开放。这种社会科学研究向度的开放，伴随的是两股“后”思潮的莅临。一是帕金所称的“后人类主义”，一是他引用阿纳特（Arnaut）所称的“后全景监控”。“后人类主义”意味着破除以人类为中心的本体论，将研究对象扩展到其他非人类物种之上，并且充分考虑生物技术带来的影响，这种扩展表现在“主体”意义上。无论是灵长动物、脊椎动物，还是技术及技术所创制的人工造物，都被认为具有能动性(agency)，这迫使我们重新审视人与非人(non-human)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不得不将这些非人也视为“主体”，这无疑挑战了以人为世界唯一主体的观点。

“后全景监控”则是更为透彻且悲观地认为，个体的完整性被“超级多元”所肢解，分散。尤其是在电子信息技术的影响下，个体很难被捕捉为具有完整人格的个体，虽然政府和公司越来越加强他们彼此的联合控制，但是个体也通过网络技术走向另一个“碎片化”的极端。这两股“后”思潮，对于帕金这样的人类学家来说，难以再用“一”与“多”的对应关系加以简单概括。“超级多元”

所指出的这种全球复杂性，使得社会科学及大部分人文学研究不得不进一步走向开放，走向对人之本质的哲学追问。这对于以人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来说，尤为要害。作为人类学的学科关怀之一，“沟通”揭示了人类学学科本身带有的“介入”或“应用”色彩。介入是说人类学家在与其调查对象“沟通”的时候，不得不对是否介入他者生活进行反思；应用是说人类学家所书写的文化翻译的调查报告，在一定程度上为跨国公司、政府、NGO组织提供了决策参考。

帕金教授在其余三场人类学专题演讲中，从专业的角度与北大师生探讨当今人类学的思考路径和研究焦点。5月16日下午，帕金教授在英杰交流中心第二会议室作题为“我们能否调和人类学中的普遍与特殊”的专业讲座，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朱晓阳、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舒瑜副进行评议。讲座讨论的是民族志方法论中的核心问题，即如何调节个案中的特殊性和普世性。讲座中，帕金运用翔实的民族志例子，追溯人类学方法论的起源、发展与转型：从马林诺夫斯基以降的数代人类学家所发展出的小群体研究，到随后伴随着全球化而出现的诸多对于人群网络的研究，最近一个阶段则是对全球化时代交往沟通的

研究。他特别注意到人群网络研究乃是因为 1990 年之前的族群关系政策已经不再适用于当前移民增多、互联网发展的新的世界格局。然而，在流动性与不确定性迅猛增加的“超级多元”时代，首先需要被观察的仍然是全球链条中的小群体。面对复杂的全球网络，人类学无能为力，它只能坚持从特殊到普遍的“田野民族志”方法论来完成研究工作。因此，层级（scale）的概念在本质上是为了调和特殊到普遍的跨越，使得人类学或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在“超级多元”时代可见可行，且具有意义。



演讲活动现场

5 月 17 日下午，帕金教授举行第三场讲座，题为“语词和符号：一个人类学的难题？”，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梁永佳、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张亚辉担任评议。帕金在讲座中指出，在“超级多元”时代，多族群混杂的社区不仅存在语言借用、重新组合的现象，而且还存在通

过符号而不是语言便达成沟通的情况，比如行车灯与广告牌。可以说，语词与符号构成了沟通的复杂性与多样性。既然如此，社区之内的人群又该如何达致沟通呢？帕金认为指号过程（semiosis）和多模态（multi-modal）沟通是交流能够达成的途径。他指出，语言人类学的研究取向试图超越纯粹的语言学研究，以及“逻各斯中心”的理性视角，这不仅揭示了“沟通”的多种模式与途径，而且其过程被视为是相当随意的，甚至是无意识的，具有一种水波或光谱般的流动性，帕金称之为“索引性”。

5 月 19 日下午，帕金教授发表题为“‘精神’作为‘物质’的一部分”的讲座。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正爱、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副教授刘谦担任评议。帕金在讲座中具体对当今世界话语中的两个关注焦点“物质消费主义”和“宗教精神”进行阐释，并从人类学的视角对“物质”和“精神”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解读。例如，凡勃仑将物质上铺张的宗教狂热视作维持甚至扩大阶级差异的活动之一，而马克斯·韦伯则持截然相反的观点，在后者看来，为宗教所支持的对物质消费的禁欲，为一个小群体的资产阶级的崛起创造了条件，他们通过节制和勤俭而区别于普通

工人。帕金将人类处理物质主义与精神性的关系归纳为五种模式：凡勃仑模式（Veblen model），包含炫耀性的消费、铺张的献祭以及一个闲暇阶层；韦伯模式（Weberian model），包含物质节俭、资产者的成功以及宗教救赎的承诺；苦行模式（Ascetic model），则将节制视作通向精神纯洁之路；庶民模式（Subaltern model），将宗教作为受压迫者的物质与精神表达；最后是万物有灵模式（Animistic model）。

5月22日下午，围绕大卫·帕金教授的系列演讲，“大学堂”讲学计划还联合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在静园二号院举办了一场题为“人类学与当代世界的危机”圆桌讨论，渠敬东主持，北大历史学系教授邓小南，社会学系教授朱晓阳、王铭铭，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杨圣敏，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张志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江湄，清华大学公共关系学院罗祎楠等参加讨论。讨论焦点由危机切入，王铭铭提出了目前存在的危机，例如异化带来的物质性、文化多样性带来的社会和文化的不对应性。帕金认为，目前所要面对的危机是一种持续性的危机，这些危机实际上表现在一些新的方面，包括移民和难民、数字革命、全球性的消费主义等

等，需要学者用“后人道主义”的方式去理解。随后，与会学者分别从自己所处的学科语境出发，对上述危机进行了深入的讨论。杨圣敏从民族学的角度，认为这些危机与其说是文化问题，不如说是政治经济方面资源分配的问题。张志强则是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认为如果将文化多样性放置在一元性框架下，实质上这并不是真正的多元主义，因而危机也就不可避免地发生。江湄将当今的危机和全球化的现代转型联系在一起，认为在第三世界中出现的复杂而深重的危机和灾难，恰恰是世界思想史的心路历程的一种表述。朱晓阳对危机并不持有悲观态度，他从后现代的角度进一步解读目前学科内部的转向和研究领域的扩展。邓小南表示，人类学的研究应该和历史学的研究联系得更密切，学科之间的跨越和交流也是应对危机的解决路径。最后，帕金回应讨论，认为沟通和交流依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无论是在人类学的历史上，还是在人类社会的解决国家官僚机构与跨区域之间的文化等多层次关系之中，人类学提供了非常好的视角和路径。参会人员发言踊跃，从各自不同的学科背景阐述了自己的观

点，会议在热烈的气氛中结束。



圆桌会议合影

附：

大卫·帕金教授是国际知名的社会人类学家，其主要学术贡献在于对非洲人类学研究、政治文化、跨文化语义学及土著哲学等方面。帕金教授于1965年在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取得博士学

位，先后担任英国伦敦大学非洲人类学教授（1981-1996）、牛津大学教授和牛津大学万灵学院院士（1996年起）、牛津大学社会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及万灵学院荣休教授（2008年起）、德国马普宗教与族群多样性研究所高级合作研究员（2009-2011）。帕金教授现为英国皇家人类学学会会士、英国学术院（British Academy）院士、欧洲科学院院士。1989年，帕金教授参与创建了欧洲人类学协会，1989-1993年担任英联邦人类学协会会长。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江南

## 技术与城市

### ——经济学家、哈佛大学经济系爱德华·格莱泽教授发表演讲

2016年5月20日下午北京大学—林肯研究院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北大-林肯中心）第37期系列讲座在北大英杰交流中心一层阳光厅举办。应北大-林肯中心邀请，哈佛大学教授、全球著名城市经济学家、《城市的胜利》作者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作了题为“技术与城市”的精彩演讲。格莱泽教授生动地介绍了世界各地大都市的发展变迁，阐释了城市是技术孕育发展的摇篮、而技术又反过来

塑造了城市的观点。他认为，高密度的城市得益于新技术和人才的集中，这不仅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有利于保护环境、推动人类文明的进程。讲座吸引了众多高校师生以及相关从业人员的积极参与，不少人从外地远道而来。



演讲现场

格莱泽教授首先阐释了他的命题，即技术和智慧是城市崛起的决定因素。他以纽约市振兴—衰退—振兴的例子说明了人口密度和接近性（proximity）对技术和产业更迭的积极作用。高密度拉近了人与人的距离，促进了观点的碰撞和技术的交流，激发了城市的创新和活力，从而推动了纽约的转型和成功。这也是西雅图、米兰等城市走向成功的原因。他认为城市化和经济繁荣以及收入增长存在正向的紧密关系。

格莱泽教授强调人力资本和教育是城市智慧的重要内容。在美国，地区的教育程度与地区的生产力和竞争力有直接的对应关系。智力的集聚会辐射一个地区的受教育程度，而智力和技术水平能够作为预测城市人口增长的因素。智力包括多个方面，其中企业家精神和创业氛围也是智力的内容之一。他认为深圳崛起的关键在于其浓厚的商业文化和

企业家精神。正是深圳的创业者、劳动者为城市提供了巨大的生产力，使深圳成为最为高效的中国城市之一。

他谈到了城市 and 人们的幸福水平的关系。和传统中对田园生活的向往以及认为乡村给人带来更多幸福感的认知相反，格莱泽教授之前所做的调查研究表明，城市居民总体而言比乡村居民更为快乐。发展中国家或低收入国家的城乡差距大，城市人口的幸福感受要远高于乡村；而在越是富裕的国家，城乡人口的幸福感受的差异就较小。此外，他还提出一个地区人口的幸福感受对该地区的未来发展具有指示性的作用。例如，随着英国居民的幸福感受的下降，英国的经济发展也相应地步入衰退。

格莱泽教授接着阐述了智慧和创新能力能够解决城市发展所面临的各种挑战。首先，大数据分析等新技术手段能准确地诊断和分析城市的教育、卫生、基础设施的情况。他列举了美国城市如纽约、波士顿如何利用大数据分析教育质量、死亡率、餐饮卫生条件、城市自来水卫生、贫民窟和市民收入水平分布等例子。此外，他还强调，创新并不仅仅局限于技术，智慧的制度和决策也能让城市的运行更为高效。例如，在“占领华尔街”运动中，纽约和波士顿两个城市应对游

行示威民众所采取的不同策略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效果：波士顿警察局的灵活、文明、坚持对话、平等尊重的智慧疏导方式，不仅让示威活动有序地进行，也维护了城市和警察的形象。而纽约警察所采取的高压、僵化的处理方式则加剧了社会对政府的不理解以及更为强烈的对抗情绪。

他强调先进的交通技术及政策、建筑规划、城市增长政策等都对城市的成功至关重要。智慧政策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即城市政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提高城市居民的福祉。他对一些流行的城市发展观点如低密度规划、反城市化运动、城市扩张限制等提出了质疑，并对一些城市中出现的极端规划抵制或形象工程提出了批评。



聚精会神的听众

格莱泽教授在演讲的最后提出了对城市和环保主义的看法。他认为城市的高密度和对资源的集中和高效利用能在

空间上限制人类活动对自然的负面影响，而且在总量上还能减少碳排放，实现真正的环保目的。

讲座最后是问答环节，来自不同学科背景的与会者积极提问，同格莱泽教授就城市经济理论、技术对城市的影响、美国的逆城镇化和中国城市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精彩的互动。格莱泽教授对提问均一一耐心予以回复。格莱泽教授的渊博和幽默也给听众留下深刻印象。本期讲座由北大-林肯中心主任刘志博士主持。

#### 人物简介：

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哈佛大学教授，全球著名城市经济学家，畅销书《城市的胜利》作者。Glaeser教授主讲微观经济学理论和城市与公共经济学等课程，曾任 Taubman 州和地方政府研究中心主任以及 Rappaport 大波士顿地区研究所主任，在城市经济增长、法律和经济学领域发表了很多文章，特别关注决定城市增长的因素以及城市作为思想传播的中心所发挥的作用。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白杨

## 2016 中美大学智库论坛在北京大学举行

2016年6月5日至7日,由北京大学、斯坦福大学共同主办,北京大学中美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和北京大学斯坦福中心联合承办的2016中美大学智库论坛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和北京大学斯坦福中心举行。本次论坛是为了落实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9月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时,双方达成的对未来人文交流层面长期投资的共识而举办的,是第七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的重要配套活动之一。

本次论坛以“全球政治新秩序:中美合作的视角”为主题,专家学者汇聚北京大学,聚焦当下的中美关系,围绕全球政治经济的热点问题,讨论新形势下如何促进中美合作、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出席此次论坛的专家学者来自中美两国学术界、政界、商界等社会各界。在为期三天的论坛中,与会嘉宾进行了充分的讨论与交流,论坛气氛热烈。

6月5日晚,在北大博雅国际酒店举行了论坛欢迎招待会。招待会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范士明主持。北京大学副校长、中美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主任李岩松在致辞中表达了对中美来宾的欢迎和对本次中美交流的希望。



李岩松致辞

6月6日,中美智库论坛开幕式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秋林报告厅举行,李岩松主持开幕式。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在致辞中肯定了本次论坛交流对中美两国的重要意义,并向莅临活动的中美两国专家学者表示热烈欢迎,他还介绍了北京大学近年来在中美教育合作交流领域取得的新进展。



林建华致辞

随后,中国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前驻法大使吴建民与耶鲁大学杰

克逊全球事务研究所、美国前常务副国务卿约翰·内格罗蓬特共同发表主旨演讲，演讲由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袁明主持，以“中美合作”为主题，主要讨论了中美当前合作主要面临的机遇与挑战，以及在全球挑战中中美需要加强合作的方面。



“中美合作”主旨演讲



开幕式合影

开幕式后，会议转至北京大学斯坦福中心进行主题讨论。讨论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庆国、北京大学斯坦福中心主任戴慕珍主持，吴建民大使、内格罗

蓬特大使就南海问题、中美经济合作、美国大选等当今中美两国的热点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



“中美合作”主题讨论

中午，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行长金立群发表了午餐演讲，演讲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主持。金立群在演讲中谈到了亚投行的成立发展、目前的决策机制及以后的业务方向等，并澄清了一些外界对亚投行的误解。

下午，第二场主题为“中美俄与全球秩序”的演讲继续在斯坦福中心举行，由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关贵海、斯坦福大学汤姆·芬格（Tom Finger）教授主持。斯坦福大学弗里曼·斯伯格里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美国前驻俄罗斯大使迈克·麦克福尔（Michael McFaul），中国国务院侨务办公室前副主任、外交部前副部长何亚非，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分别发表主旨演讲，围绕全

球秩序改革、中美俄对于全球秩序的看法、俄罗斯在全球秩序中的位置进行了讨论。



“中美俄与全球秩序”主题演讲

之后，论坛进行分组会议，三个小组讨论的主题分别为“中美对全球变化及不确定的看法比较”“中美及未来的地区秩序”和“未来中美关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前驻冰岛大使苏格，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布鲁金斯学会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卡内基-清华中心主任韩磊（Paul Haenle），斯坦福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斯蒂芬·克拉斯纳（Stephen Krasner），外交部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前驻以色列大使陈永龙，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前院长杨洁勉，上海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黄仁伟，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荣等参与发言讨论。

6日晚，文化部前部长、第12届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蔡

武发表晚餐演讲，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主持，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主任朱善璐出席并讲话。蔡武教授在演讲中强调了中美加强文化交流的重要性，希望世界能够实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

6月7日上午，外国嘉宾集体前往国家博物馆参加第七轮中美人文交流高层磋商机制全会，全会由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和美国国务卿克里作为机制双方主席分别致辞。全会中，中方机制协调人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及美方机制协调人国务院副国务卿斯坦格尔分别汇报了工作磋商成果，其中郝平高度肯定了本次中美大学智库论坛，并作为第一项重要成果向全会作了报告。

下午，分组讨论继续进行，三个分会场的议题分别是“全球政治秩序存在的潜在挑战”“中美智库及政策制定比较”“中美经济合作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耶鲁大学校长苏必德、中国对外经贸部前副部长龙永图、芝加哥大学保尔森研究所副主席方艾文（Evan Feigenbaum）等人在各自会场发表了主旨演讲，并与在场的国内外学者进行了讨论。

论坛最后，贾庆国、汤姆·芬格和北京大学燕京学堂副院长、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前会长何立强（John Holden），对两



天论坛的过程与成果进行了总结，对未来的中美关系和世界秩序进行了展望。

本届中美大学智库论坛历时三天，完美谢幕。此次论坛是中美两国之间的一次重量级会议，与会学者发言积极、坦诚，互动热烈、务实，在深入探讨两国间存在各种问题和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了不少应对挑战、改善关系的中肯建议。论坛的成功

举行对于增进中美双方的理解和沟通、促进中美合作、巩固中美之间的人文交流具有重要意义。

本次论坛得到了教育部和太平洋国际教育交流基金会的支持及大力协助。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山石

## 网教之声

### 在线教育将如何影响印度

在入学学生人数世界第一的印度，如何解决全民教育的难题？不断涌现的在线教育创业者正在用互联网改善这一古老而重要的行业。

阿比谢克·巴贾杰和罗希特·巴贾杰是印度一家互动式教育平台 Zeroinfy.com 的创始人，在这家 2015 年 1 月创立的在线教育平台上，学生可以购买由教师制作的视频讲座，可以向同伴学习，也可以将自己的笔记在与其他的学生分享。

游历了印度全境的阿比谢克和罗希特已经与加尔各答、德里、孟买、普奈、金奈、斋普尔和焦特布尔的教师取得了联系。“在经过尽职调查之后，我们才会与教师合作。合格的教师需要至少拥有 5 年的教学经验，至少教育过 1000 个学生。一旦决定合作，我们就会把他们的教学视频搬到我们的服务器上。我们花了 6 个月的时间来开发这个平台，然后测试还花了 2 个月的时间。”

以家人朋友资助的 100 万卢比的起步，目前 Zeroinfy 拥有了 8 位雇员，和 25 位来自不同领域的导师作为内容生产

者和监督者。通过数字营销，Zeroinfy.com 已经吸引了印度二线城市的注意。学生们首先会观看网站上的展示视频，然后进行购买相应的课程，价格从 500 卢比到 10000 卢比不等，而线下课程的价格要比起线上课程贵 60%。2015 年 12 月和 2016 年 1 月，Zeroinfy 的营收达到 32 万卢比，2 月单月营收估计将达到 25 万卢比。

#### 印度理工 CEO

在人口规模多达 12 亿的印度，能进入最高学府、成为印度理工人、出任 CEO 的互联网精英相比于人口基数仍然是少之又少。事实上，在城镇化率仅有 30% 的印度，是否实现普及教育将深深影响这个国家的未来。

尽管印度上学的孩子总数高达 2.5 亿，位列全球第一，但根据印度 2015 年度教育状况报告 (ASER)，2014 年全印度只有 50% 的五年级学生可以理解简单的英语句子；三年级的学生不知道 1-100 数字；只有 50% 的五年级学生可以做类似

减法和除法之类的简单算术——二年级的学生就应该学过这一点。

当前，印度教育体系最大的问题就是缺少高质量的教师。根据印度联和人力资源发展部的数据，2010年全印度的小学中超过90万教师职位处于空缺状态。即使有教师的学校，他们中的许多人也对教育没有热情，或者缺少核心的教育技能和知识。尽管据预计，到2020年印度的识字率将达到80%，接近于84%的全球平均水平，但是没有真正教育的识字率并无意义。

### 在线教育印度破题

印度教育路在何方？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兴起提供了可能的答案。尽管大约有约10亿印度人尚未连接上网络，但智能手机的兴起、互动课本、游戏化和数据分析已经彻底改变了印度的教育产业。印度总理莫迪也提出了“数字印度”倡议，旨在以数字技术解决当前教育系统的顽疾。

当前，随着互联网技术开始提升教育的质量，一个稳步增长的教育技术市场已经开始在印度成型。印度的教育市场不断涌现的初创企业将技术和学术工具结合在一起，为学生的学习体验带来了创新的方式，Zeroify.com正是其中

的一个缩影。根据印度品牌证券基金会(IBEF)的报道，印度的在线教育市场规模到2017年预计将达到400亿美元。通过提供实时的课本更新、网上指导、教育娱乐、高清的教育视频和线上的考试准备，今日印度的教育产业创业公司已经开始影响到一大批观众，包括印度二线和三线城市的居民。

目前，印度互联网教育行业最著名的创业公司包括Vedantu(帮助教育机构开发APP)、Simplilearn(线上线下专业人士培训)、BU(趣味教学视频创作)、Toppr(线上考试准备)、Iprof Learning Solutions、Meritnation、Edukart(线上商科硕士学习)、Talentedge(互动学习解决方案)、Superprof和embibe.com等。

通过证明自己在改变教育行业的能力，印度的互联网教育创业者也已经吸引了风险投资者的注意。目前，Vedantu已经从老虎环球基金(Tiger Global)和加速合伙公司(Accel Partners)融资500万美元。Toppr从软银亚洲投资基金(SAIF)、Helion和富达增长(Fidelity Growth)筹急了1000万美元。Meritnation从InfoEdge融资500万美元。Simplilearn从梅菲尔德基金(Mayfield Fund)和Kalaari Capital融

资 1500 万美元。Edukart 从 YouWeCan Ventures 和 United Finsec 融资 100 万美元。

“今天，教育者们使用智能手机作为重要的教育工具。通过分析手段，教师们可以便捷地评估学生的表现。这也使教育机构可以分析教师在班级中的表

现。”云上教育平台 WizIQ 的首席收入官 Maneesh Sharma 表示。

作者：阎彦

来源：一财网

## 未来影响在线教育发展的十大关键性技术

据国际权威研究机构 Gartner 最新统计数据，2016 年全球用于在线教育领域关键技术研发的资金将超过 382 亿美元，较去年仅增长 1.2%。这个数据似乎与国内炒得火热的人工智能、AR/VR 等技术的状况不相吻合。但在笔者看来，这种“体感温度”的巨大差异，恰恰说明我国的在线教育仍然是最保守且发展缓慢的市场，关键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往往落后于其它主流产业 3-5 年时间。全球领先的公司正在将重心从原先的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转到运用创新技术提升相对竞争力，并支持发展新的商业模式。在未来激烈竞争中能够生存的在线教育机构必须抓住这一趋势，运用更多的创新技术来驱动产业创新。为此，笔者整理了影响在线教育发展的十大关

键性技术，及其在在线教育领域的应用前景。

### 1 自适应学习

自适应学习技术在未来 3-5 年会成为在线教育产品的标配。其目标是能够根据学生的反应和偏好动态调整教学内容的呈现方式，依赖大规模的学习数据的收集和数学算法，从而最大化地帮助学员达到所制定的学习目标。其核心是要解决两个基本问题：一是如何通过特定数量的试题精确地掌握学员对于知识的掌握程度；二是确定学员从现在开始应该学习哪些新知识，即推荐功能。这其中涉及了四大关键技术：路径规划技术，项目反应技术，概率图形技术，层

次聚类技术。

## 2 预测分析

预测分析法是从多个来源的数据中提取出一个分析模型来预测未来的行为或者结果。预测分析是教育机构提高成绩以及减少成本的关键部分。大多数教育机构声称拥有自己的分析能力，但是很少有工具能实现真正的预测分析。

## 3 客户关系管理

客户关系管理现在被普遍视作是跟踪和管理学员、家长、学校、校友以及其他机构关系的有效工具。客户关系管理系统主要有两个目标：一是对以学员为核心的业务流程的自动化和提升，二是获得可用于分析的数据，提高机构的决策质量。客户关系管理可以用于支持学员学习生命周期的所有环节。

## 4 外部架构

外部架构意味着可以集成越来越多外部合作伙伴的产品，包括教育系统中的工具和服务。这种技术可以让教育机构的系统更多地借助云计算的力量，而不需要去投入研发和本地部署实施。通过标准化的实施，可以让教育机构具备更强的适应能力。

## 5 开放式微认证

在社交化的网络环境中，微认证证书已经以如徽章的形式存在了很久时

间。但是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这些环境都是专有的，很难移植到学习环境中，而开放式的微认证则希望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作为一项核心技术，开放式的微认证仍然不成熟，但是国际上开放式微认证在教育领域里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笔者认为这是一项投入成本很低但极具价值的投资，具有很高的投资回报率。

## 6 数字化评估

数字化评估指的是通过技术运用来创建、管理、报告和管理各类考试和评测。这是在线教育领域里越来越重要的方向，并且开始融入了其他领域的技术，如数据分析、自适应学习等等。许多机构正在增加在评估技术方面的投入，而这种需求通常来自机构的不同部门，并由不同部门的需求来驱动。评估工具是实现大规模个性化的关键方式。

## 7 智能机器人

智能机器人是当下最令人兴奋的新趋势，它采用自适应学习和数据分析手段提升教育的学习算法。智能机器人能够更好地帮助机构评估自身的价值，也同时更好地评估学生的价值，并建立更好的品牌。智能机器人还能够分析学生和教师的建议，提高学习研究的效率。

## 8 开放教育资源生态系统

开放教育资源生态系统的各类教育内容和媒体是随处可以获得的，而且免费的越来越多。这些工具和服务能够提升开放内容的质量和生产。开放教育资源生态系统并不是新名词，但是其降低了学习成本和增加了对教育内容和渠道的控制力。开放教育资源表现出了 5 个方面的特性——用户可保留、重用、修改、混合以及对内容的自由分配。

### 9 声音和传感技术

声音和传感技术是一系列虚拟功能的集合，包括通过社会化活动抓取和分析社会化聆听和情绪分析功能。在在线教育领域，社会化聆听工具和社会化获取工具还处在早期的阶段，它通常被运用到学员招生录取阶段，然而其在整个

学生的学习生涯中都能够发挥很重要的作用。但是现在全球教育机构运用这方面的能力还非常初级。

### 10 协同技术

对于构建在线教育领域中的基础环境，沟通和协作是必不可少的。协作技术对于推广研究和团队合作很有用。随着全球化的网络教育生态系统的发展，由于地理位置上的分散，这种协同能力的运用尤为重要。

作者：尉迟道坤

来源：《在线学习》杂志

## ■ 北大人物

### 刘意青：身逢沧桑意常青

【编者按】“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君子治学处事，立志高远却又基础扎实，胸襟开阔更能兼察微理。北大老前辈们用自己的人生为这种君子之风做了很好的诠释。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离退休工作部启动了“君子志道”专题访谈活动，走访了一批离退休老同志。

在这些交织着历史沧桑和个人生活的回忆中，我们看到了在历史长河中北大人默默担当的身影，感受到了北大人浓郁沉淀的家国情怀，体会到了北大精神的深厚源长。本期“君子志道”访谈专题，将带我们一起走进北大老前辈们的朴实与精彩。

午后的阳光明媚异常，我们在去刘意青老师家的途中，接到她再次叮嘱我们她家路线的电话。刘老师在家中热情地招待了我们，询问我们的学习情况。在这样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我们开始了今天的访谈。



刘意青在延安南泥湾参观时留影

### 回望如烟，往事尽沧桑

刘意青是研究英国文学的专家，但她与英语的结缘却完全是一个偶然。

刘意青出身于学术世家。父亲刘世沐 1936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外语系，是研究英语语言和英国文学的名家。母亲中文系毕业，生性文雅，落落大方。尽管父母并没有刻意引导她，但从小耳濡目染的刘意青“念书时一直是语文比数理化好，外语成绩尤其不错”。上世纪 50 年代，国内中学的外语教学大多为俄语。刘意青俄语成绩突出，她的老师建议她大学期间继续学习俄语。年轻的刘意青也喜欢苏联电影中那些明快的生活、工

作节奏。“我那时受苏联电影《米丘林》的影响，一度想去学习和植物、园艺有关的专业，可考虑到我的数理化成绩中等，只好作罢。”当时英语教学在国内并不受重视，自己又已经学了六年俄语，所以在填报志愿的时候，刘意青把俄语作为第一志愿，英语作为第二志愿。没有想到，她没有被俄语系录取，而是阴差阳错来到了英语专业。

1959年，刘意青被北京大学西语系英语专业录取，而当时的她几乎没有任何英语基础，只得从头开始学。她回忆道：“当时我们班上有一个年纪比我们大很多的华侨学生董思远，刚入学时就已经能阅读英文小说了。除了我之外，还有三个同学在中学学的是俄语，班上同学的水平就是这样参差不齐。”虽然当时英语教学在国内并不受重视，幸而北大西语系有多位学术功底深厚的先生，并且班上同学们的学习热情很高，过了约一年的时间，刘意青终于入门了。

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刘意青对英语的兴趣一发不可收拾，她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专业学习上，并对英国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然而，“按照当时的规定，我们每个星期至少要拿出半天时间进行政治学习，到了夏天有三到四天甚至整个一周

都要去海淀郊区割麦子”。除此之外，刚刚上大一的刘意青和同学们还被下放到北京郊区的黄土岗进行劳动锻炼，到北京的密云水库拉沙土……高强度的劳动令大多数同学苦不堪言。

紧接着三年困难时期，由于当时学生普遍营养不良，大部分人出现了身体浮肿的症状。学校因此把教学进度放慢，根据同学们身体浮肿的不同程度划定“级别”。“当时脸部浮肿是一级，还勉强可以去上课；腿部浮肿是二级，就只能在宿舍卧床休息了；到了三级全身浮肿就必须送到学校医院住院治疗了。”因为学生的身体状况，学校不再要求学生进行高强度的劳动，刘意青便利用那段时间读了很多书，给自己“补课”。刘意青开玩笑说：“这么看来，营养不良和浮肿也不完全是坏事，难得少了那么多会议和劳动，可以安心学习。”

1964年，刘意青从北大西语系英语专业毕业。从三年级开始，她的学习成绩一直非常优异，于是留校担任了教员。她说：“我们这一代人不像现在的学生能有很多自主选择的机会，基本上就是接受组织分配。其实选择太多，眼花缭乱或不断更换职业，我并不认为是一件很好的事。”

留校最初，她先后被下放到郊区定福庄和门头沟的农村参加“四清”运动。第二年，刘意青在五一回京结婚。“四清”要求下放干部与农民同吃同住，在门头沟山里她被安排到当地农户姜大娘家。不久刘意青怀孕，一开始她并不知情，仍然每天参加山里的背粪劳动，高强度的劳动使她出现了流产的先兆。“当时的小山村很贫穷，一年里有半年的时间都要吃杨树叶子——先把树叶用水煮，把苦味去掉后将叶子剁碎，混着高粱米或者小米一起蒸饭。就是在这样的生活条件下，姜大娘还会拿出她贮存的，用来换酱油、醋和针线的鸡蛋，每天让我吃一两个。”在姜大娘的悉心照顾下，刘意青的身体慢慢恢复，保住了孩子。提起姜大娘，刘意青的语气中满是感激：“每天晚上她怕我冷，就让我睡到炕中间，把她的被子盖到我的身上。”

1965年底，组织上安排她回京参加教学，当时她已怀孕四个月左右。虽然农村的条件十分艰苦，刘意青还染上了虱子，但当地老百姓的淳朴善良给她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使她对中国农村和中国最广大的劳动群众有了很深的感情。

“当时确实是吃了不少苦头，干过很多又重又累的活，比如经常背着柴走

十几里山路，但是我一点都不后悔。如果没有那段时光的话，我就不是今天的我，老百姓教给了我很多。”正是这一年多的经历，使她开始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农村老百姓。她感慨地说：“直到今天不管我遇上出租车司机还是普通农民都不觉得有什么隔阂，大概也是得益于那段日子……我也希望当代年轻学子的心胸能够更宽广，在掌握书本知识的同时多多了解中国社会，与各个阶层的老百姓接触，起到桥梁式的作用，而不是局限在某个阶层、某个领域。”

### 求知若渴，三赴留学路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停课闹革命。复课后刘意青先是留在北京参加“开门办学”，同学生一起到外印厂去边劳动边教课。后来，她又到最远的郊区延庆山里“备战备荒”，上午在炕头上上课，下午挖防空洞。之后因与军宣队意见不合，她被调离教学，下放到江西鲤鱼洲北大农场。在那里他们种稻子、修大寨路、挖红旗渠、搬石头、扛水泥。一年后因血吸虫病肆虐，北大、清华的农场撤销，下放教职员回到了学校。由于刘意青劳动积极，与学生的关系十分融洽，再加上历史问题较少，1973年她被公派到英国半年，进行英语教师

的专业培训。第一次踏出国门，刘意青在英国特别认真地学习教学方法，并努力提高听说能力。但半年的时间实在太短，想要读更多书的她觉得实在是意犹未尽。

高校恢复统一招生后不久，刘意青承担起更多的教学工作。1981年，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本尼分校访学时，刘意青主动申请了该校的硕士项目，在美国攻读了硕士学位。“一到美国我就参加了那个学校的美国文学硕士项目，北大校系并没有打算让我在那里念硕士，但我想我已经这么久没有好好念书了，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本来是为期一年的访问，但刘意青又申请了一笔基金延长了半年，用一年半的时间读完了硕士学位，此时刘意青已经40岁。她还一度想过接着在布朗大学念博士，布朗大学也接受了。但考虑到恢复招生后的北大很需要英文教师，便暂时放弃读博的计划回到国内教书。5年后，她又向学校提出申请去美国念博士。“我前半生很多时间都在劳动，在社会大学中锻造了很久，觉得还是很有必要把自己的专业水平再提升一下，才能真正胜任北大的教学与科研任务。在国外的那些年我获得了英美文学专业方向的博士学

位，对我认识美国社会的帮助真的很大。”

尽管“四清”和文革耽误了刘意青很多专业学习的时间，但她始终没有放弃对英国文学的兴趣。50岁时，刘意青终于获得了芝加哥大学的英国文学博士学位。“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从未想过留在美国，而是一心想着赶紧念完回国，也没有在美国游览太多地方，就是一门心思读书。”

刘意青在留学期间阅读了大量的文献资料。“纽约州立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给我的营养，就是在很短的时间里以压缩饼干的方式，压给了我大量的东西。这些东西也许我当时没有消化得再好，但是回国后在教学的过程中慢慢稀释、慢慢消化，这段学习经历使我终身受益。”



刘意青在加拿大使馆主持爱丽丝·门罗的研讨会

刘意青在回忆起这段海外经历时语重心长地说：“凡是真正体验过英美国家的生活、深入了解英美国家文化的人，绝不像有些短期留过洋的人那样否定中国的一切。一些早年在英美国家留学归来的老先生就是留学生爱国的很好例子。当他们在国内忍受经济上的贫困和政治上的迫害时，也很少有人因此做不利国家的事，或说有害国家的话。反而是一些并未亲身体会过海外生活的人，通过一些来自文学作品或影视等的粗浅认识，才会一味崇拜西方所谓‘先进’的生活方式。”“我觉得我还是很有运气，我在国外念书这么多年，北大还依旧接受我回来，使我有机会一直做一名‘北大人’。”

多年的海外学习经历给重新回国执教的刘意青很多新的启发和灵感。“我深刻认识到光让学生流利地说英文是不够的，还必须通过文学教学让学生了解西方人的认识论、了解他们的思辨特点。中国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儒学和道家思想都是我们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但是近代以来这些思想并未能够很好地传承下来。而西方从15世纪以来开始发展资本主义，他们的政治、经济、宗教思想都在一直延续着。”刘意青认为中国不能一味学习西方，西方发展的理论基

础可以追根溯源到几百年前，而中国很多方面发展还不成熟，对传统未能较好地继承。“我觉得这些东西是需要在大学英语课堂上让学生了解并思考的。”

刘意青提醒我们一定要注意到西方文化所宣扬的并非一直都是后现代的绝对个人主义，而是一直在强调正直、同情、包容，甚至自我牺牲这些美德。道德的维度在英美文学中有着很深的积淀。18世纪的英国文学就特别强调做人要诚实守信、富有同情心，狄更斯描写了很多社会下层百姓的苦难，宣传同情心和慈善。美国也有这样的传统，比如富兰克林在自己的成长过程里每天用13条美德来约束和检讨自己。“所以我们要系统、全面地介绍外国文学，特别是他们与我们相类似的商品社会发展阶段的文学。在我看来，从事外国文学教学研究的学者应当勇于承担这样的任务，那就是要彻底厘清蕴含在西方文学中的道德伦理、民主自由，然后思考其与中国现实问题结合的适用性和可能性。”

### 传道解惑，课堂上的“刘姥姥”

在北京大学，刘意青被同学们亲切地称为“刘姥姥”。这位“刘姥姥”不光活跃在燕园，也经常出现在其他高校。



刘意青在课堂上

1992年，时年83岁、已经双目失明的美籍爱尔兰人布里几德·克阿女士来北大看望老朋友刘意青，表达了想让刘意青去延安大学帮助建设外国语学院希望。此前，克阿女士已经在延安大学志愿任教达五年之久，因为双目失明，她无力再继续教学，却始终放不下延安大学的学生们，想找一个人继续她的事业。刘意青了解以后十分动容，义无反顾地接过这根接力棒，一做就是20年。

在此后的20年里，刘意青数次去延安大学讲学、作报告、办培训班、捐赠图书资料。在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和英语系支持下，刘意青用了七八年时间，先后为延安大学外国语学院培养了语言学

和文学硕士教师各5名，并帮助他们争取到了硕士点。目前延安大学外国语学院在陕北、乃至陕西省的地位已大大提升。每次去延安讲学，刘意青都会将延安大学给她的课时费和报告费全部捐给延安大学外国语学院作为学生活动经费，以期为外国语学院的发展尽自己一份薄力。

2008年，一直积极走在国家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校工作前列的北京大学，决定派出刘意青赴新疆石河子大学外国语学院任教并担任学院行政领导。当时刘意青已年近古稀，已经从教学前线退休。她深知西部地区生活条件的艰苦，但还是接受了学校的安排，义无反顾地前往石河子大学外国语学院担任院长。

“我本来计划在石河子工作满三年，却因为冬天在雪地摔腿摔坏了，就只在新疆工作了一年半。”即便回到北京休养，她仍然继续履行着作为石河子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的职责。“那边学院里面的大事小事还是会找到我，我会尽力地为他们解决。我也希望我在石河子遇到的优秀学生们学业有成后，能够继续为石河子大学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从新疆回到北京后，刘意青本该安享晚年了，但她却闲不下来。怀着对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的热忱、对青年教师

的成长的关心，她于2012年参加了北京大学的“老教授调研组”，深入课堂了解教学，特别是青年教师的教学情况。这样的调研督导对于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来说，并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因为家住东直门，有时候为了去听早上8点钟的课，我6点就要起床，6点半出发去学校；有时上午、下午要连续听课，中午没有地方休息，我就在理教或者二教的桌子上趴着睡一会儿。”尽管工作辛苦，但是想到这是自己还能为学生做的事情，刘意青便尽心尽力。

2012年10月，刘意青再一次来到延安大学，这一次她带来了10万资金在延安大学外国语学院设立了一个教育奖，用以资助和鼓励在学习和工作中成绩突出的师生。此前，她曾以父亲的名义在北京大学外语学院捐资10万元，设立了“刘世沐奖学金”，用以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2009年，在新疆石河子大学外国语学院挂职的她，将对口的工资全部捐出，为家庭经济困难、品学兼优或有突出贡献的学生设立了“刘意青基金”。即便这样，她还感到遗憾：“我靠工资生活，奖金数目有限，不能资助更多学生。”

如今，刘意青出入教室的机会越来越少了，但她对教学事业却是一如既往

的热爱。通过多年来的观察体会，对于目前高校课堂教学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她也有自己的担忧：“根据国际上包括美国教师的职业规范，教师是不能在课堂上讲与课程无关的内容的，尤其不能在课堂上发牢骚，课堂不能成为有些人煽动学生的平台。”

而对于目前学生的研究和写作能力，她认为现在很多学生的论文写作缺乏新意，尤其缺乏自己的思考：“我见过的很多学生论文写哪个作家就一味说那个作家的话，而没有自己的批判精神。这些都是年轻学子应该注意纠正的。”

“国内经常有人把博士看得很权威，但是在国外博士只是研究某门专业学科的开始，也不会像国内要求念书时一定要发表论文。像我们目前这样要求，学生就把宝贵的读书时间都花在绞尽脑汁写那些不成熟的文章，还要找门路甚至花钱去发表。”她认为做学术研究尤其是人文学科，不应该急于以写论文和发表论文为目标，要先踏实地多读一些书，然后再写文章，绝不能生搬硬套。

“我们要把精力更多地放在引导学生读书积累知识上，而不是试图使学生达到现有水平无法企及的目标。”（文/李臻）

### 人物简介：

刘意青，1941年出生，196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英语专业并留校任教，后相继获得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本尼分校美国文学硕士学位和美国芝加哥大学英语系哲学博士学位。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外国语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全国高校外国文学教学研究会副会长，外国文学学会理事，哈佛燕

京研究院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英国18世纪文学、英美19世纪小说、《圣经》文学和加拿大文学。2008年，刘意青教授选择赴新疆石河子大学任教并担任石河子大学外国语学院院长。先后在北京大学、石河子大学分别设立“刘世沐奖学金”“刘意青基金”，用以资助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白杨

## 胡军：探究学理 立己达人

【编者按】“君子之志于道也，不成章不达。”君子治学处事，立志高远却又基础扎实，胸襟开阔更能兼察微理。北大老前辈们用自己的人生为这种君子之风做了很好的诠释。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离退休工作部启动了“君子志道”专题访谈活动，走访了一批离退休老同志。

在这些交织着历史沧桑和个人生活的回忆中，我们看到了在历史长河中北大人默默担当的身影，感受到了北大人浓郁沉淀的家国情怀，体会到了北大精神的深厚源长。本期“君子志道”访谈专题，将带我们一起走进北大老前辈们的朴实与精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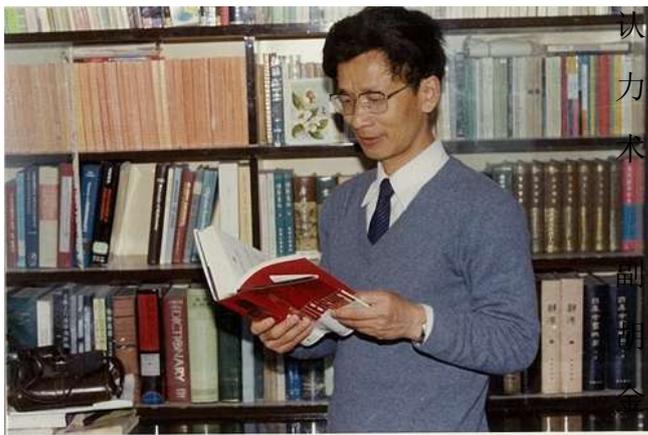
“我和你对于哲学的理解不太一样。”说这话时，胡军坐在人文学苑某会议室门外。墙的另一边，人声鼎沸，他马上要在这里参加一次重要会议。

胡军今年65岁，已经退休，但仍然闲不下来。这一周，他几乎每天都要从城郊的住处赶到北京市区，参加各种会议和活动，花在路上的往返时间就得四个小时。

他掰着手指数着那些沉甸甸的头衔：中国创新战略委员会主任、民进中央文化艺术委员会主任、北京市哲学学会会长……

在这之前，他的主要身份是北大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他师从汤一介教授，主攻中国现代哲学和知识理论，是最早系统地研究金岳霖《知识论》一书的学者之一。

形而上的哲学研究与形而下的社会事务，两者似乎略有出入。但在胡军看来，哲学本身并非虚无缥缈，它就是源于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问题或困惑。“所以我觉得我对于社会活动的参与，更有助于我的哲学研究。”



胡军

### “异类”

2005年8月，“金岳霖哲学思想研讨会”上，胡军参与撰写的《金岳霖学术思想研究》获得一等奖，博士期间撰写的博士论文《道与真：金岳霖哲学思想研究》获得二等奖。胡军因此成为该次学术会议上获奖最多的学者。

身在中国哲学教研室，胡军却因为研究金岳霖而格外关注逻辑学与知识论的研究领域，并且更加深入地了解并推崇西方哲学体系。

他经常说自己显得很尴尬。“哲学界的其他学科的老师比较认可我；但在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看来，我却是异类。”

中西相较而言，中国传统重视经验和古籍经典，而西方学术研究的核心步骤是逻辑论证。胡军用《论语》举例，认为孔子仅给出结论，却缺少具有说服力的论证过程，而苏格拉底的精神助产术则是启发学生自己思考。

现在郑州大学哲学系任职的张永超副教授是胡军指导过的博士，在他看来，胡军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接续了冯友兰、金岳霖以来的研究传统，试图回到问题自身做学理的探究，而不再通过人头、主义、地域、国别、时代分科。“这是一种‘告别古今中西，回到问题自身’的思路。”

与重视史料的哲学研究方法不同，胡军认为，史料研究固然重要，因为它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学者应该善于提出新的问题，做系统的结构性的理论思考与建构工作。

此外，他强调要敢于挑战经典和权威。他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都与金岳霖有关，他也将相关著作读过数十遍，但他不同意金岳霖的一些观点，在论文中与之展开对话。

“比如我有这样一个观点，即金岳霖认为只要感觉者的感觉是正常的，那么他通过感觉所获得关于外物的内容就是客观的。我不同意他的看法，花了大量篇幅论证到，即便是正常的感觉，得到的感觉内容也不是客观的。在这个问题上，金岳霖还局限在一个很狭小的理论圈子内，他不知道与感觉认识相关的科学生理学方面的内容，我则能够提供大量的关于感觉生理机制研究的系统材料来证明金岳霖相关观点的局限性。”

金岳霖的学生、当时中国逻辑学界资格最老的学者周礼全当年也参加了胡军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从个人情感上说，老先生并不认可胡军对金岳霖知识论一些观点的尖锐批评，但他认为前者的论文分析深入，有新意。包括张岱年在内的许多知名学者也表示了对胡军的认可，认为他敢于质疑权威，并有系统的论证，他的研究成果代表了中国哲学研究的发展方向，建议出版他的学位论文等。

在古希腊诸多先哲中，胡军极尊崇亚里士多德。事实上，他也践行着“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这句名言，尽管这种特立独行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使他不免遭遇批驳和反对，处境难堪。



胡军在哲学系建系 90 周年活动上留影

## 出走

打小开始，胡军就不是一个盲从的人，他直言自己“比较欣赏一种孤独、独立的状态”。

1951年，胡军出生于上海市城隍庙的东南的角落里。在繁华的洋租界的衬托下，这里显得窘迫而寒酸，缺少统一规划。贫穷的老百姓都住在这里的棚户区。

胡军与母亲以及四个兄弟姐妹一起生活，一家人住在十平方米左右的房子里。房子在一楼，木质天花板几乎不隔音，有时能听见楼上住户小便的声音。当时没有公共厕所，居民们多用木桶收纳粪

便。每天清晨五点，一辆专门收集粪便的粪车到达弄堂口，胡军经常把马桶拿出去，将其中的粪尿倒进粪车内，然后洗一洗马桶，拿回来接着用。

胡军的母亲当时没有固定工作，是纺纱厂的计件工，所有收入都按实际生产数量来计算，每月收入大概三十元。孩子们自然要帮忙，胡军作为长子，往往要承担更多的活儿。

“比如织毛衣，”他两手比划着，“先把前襟和后襟缝起来，再把袖子装上，最后缝领子，我现在还会。”

在胡军眼里，母亲是个自立的女人，但也希望作为长子的胡军能承担更多家务，对他管束很严。如果胡军因贪玩而误了家务，母亲动辄打骂。“我不是一个喜欢被管束的人，所以后来就偷了家里的户口本，自己去派出所迁户口，报名下乡去了。”

1969年9月13日，18岁的胡军第一次出远门，火车从温暖湿润的大上海驶向寒冷干燥的黑龙江嫩江农场，他在火车上待了三天三夜，没有过多考虑可能对东北气候和乡村生活的不适应。这次出走充满欢乐，“我是一个自立的人，像我妈一样，而且此后我有了更多自由。”

由于中学曾在体操队训练，胡军身体健康强壮，不怕累不怕冷，干活速度快。他在水房打水，穿着短袖，露出手臂上健硕的肌肉。本地的青年在十几米外站着，等他走了才去打水。“他们看我肌肉发达，就以为我很能打架，所以有点怕我。其实我是很文的，我是从不参加武斗的。当然，小时候在上海的弄堂里与孩子们在一起淘气，免不了打过几次架，由于我身体强壮、动作敏捷，所以总是我赢。”

离开上海去黑龙江农场时，胡军随身带了两个木箱子，一箱是生活用品，另一更大的箱子里满是书，里面装满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资本论》，以及列宁的《哲学笔记》、毛泽东的《矛盾实践论》、普希金的诗等书籍。

白天，胡军在农场割麦、打谷，深夜，回到马厩临时改造的宿舍里。五六十个人挤一间屋子，中间是火炉，两边是南炕、北炕。大部分人聊天打牌，九点左右就睡觉。他则以木箱为案，在此起彼伏的呼噜声和熏天的汗臭中借一盏煤油灯的光亮读书，凌晨入睡，日出前便要起床。在农场的六年生活中，胡军几乎每天如此。

闲暇时间，他还爱练字。现任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的马以鑫和胡军当时在同一个连队。他至今仍记得胡军有一本自己手抄的《浮士德》，十六开左右的白纸，由胡军自己线扎装订。“他是用蓝色钢笔抄写的，版本应该比较老了，里面还有很多繁体字。”

在书籍极度匮乏的年代，胡军居然有这么一本手抄的《浮士德》，现在回想起来，马以鑫仍然感到“十分震撼”。“我之后再也没有遇到这样的人。”

二十多年后，当马以鑫听闻胡军成为北大哲学系教授时，感到振奋，但一点也不惊讶。“他从十几岁开始积累，所以有后来的厚积薄发。”

### 困惑

从黑龙江嫩江农场到哈尔滨师范学院再到北大，胡军的刻苦钻研使得他的学术道路很顺遂。在北大读博士期间，他开始深入系统地研究知识论，自觉地从知识理论及其思辨能力角度来审视中西文化之间的本质差异，并以此为基础开始思考中国当代的社会现状及困境。

这时，他很有些踟蹰了。

“我很困惑。”两个半小时的采访中，胡军五六次这样表达。每次说完，

他总是撇撇嘴，有时是费解，有时更像是无奈。

胡军为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碰撞过程中前者不断丢失的话语权感到痛心。在他的定义中，话语权是指在分科治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系统严密的知识理论体系。“我们丢失话语权的历史原因在于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明确或相对明确的问题意识或研究对象，而长久以来迷失于模糊笼统的思维方式之中。”

现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博士后的雷爱民从 2011 年开始跟随胡军读博士，在他眼中，胡军是一个“有良知的现代公民”。张永超也提到这一点，“他关心水资源枯竭问题，关心现代社会的城市病，关心碳纤维的最新发展，关心网络对现代人心的影响，关心中国发展模式的技术依赖、代价与成本。他对学界、教育界现状的担心，甚至夹杂着某种悲观。作为老师，我们往往希望他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胡老师却常说‘我很困惑’。”



胡军参加会议

胡军明白自己能做的比较有限，但还是努力通过自己的社会职务干一点事情。2003年至2012年，他担任北京市第十三届人大常委会常委，期间他的不少提案得到落实。2003年，他牵头起草了一个文件，向北京市领导提议将畅春园、挂甲屯和肖家河附近的一千亩地划给北大，以支持北大校园建设，这才有了后来的畅春新园。

2007年，胡军的邻居找上门，称自己的弟弟在通州农村务农，耕种土地被国家征用，政府当时答应退休金及医保迟迟没有落实，希望胡军能帮忙解决。于是胡军马上写了一份报告，递交给北京市农委主任。农委主任认为，如不马上解决这一问题，怕有社会隐患，所以

通过各种渠道迅速妥善解决了这一问题。当地的农民都感到很满意。

卸任人大常委后，2014年初，他开始担任创新战略委员会主任，主要负责组织会议、确定会议主题、对会议内容进行提炼和总结。结合对知识理论的研究，他多次发表论文，认为国家和政府要用知识创新引领未来社会的发展，建议中国政府应该组织相关人员研讨如何在知识理论体系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产业革命，走出新的路子，而不能仅仅沦为产品的模仿、加工、组装。

他还从当代中国高校的管理模式上进一步剖析，批驳当前不合时宜的管理模式。胡军认为，知识创新就是对主导思想的背离，就是对传统文化的反叛。所以，高校及研究机构内的传统落后的管理模式需要适时进行改革，需要不断去适应知识创新和理论研究的新形势。长期的苦恼及思考遂使胡军于2012年写下了一篇题为“知识创新与世界近代格局的变形”一文，他认为中国文化的复兴的唯一出路就在于培养和提高学术精英的理论理性思辨能力，积极深入推进各个领域的知识理论体系，并在此基础上稳妥而有效地推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他的这一看法得到了学界的认同，2016年2月初《科技导报》的主编邀请

胡军写文章为两会的代表和委员提供相关的信息。他抽出时间写了“知识创新引领未来社会发展”一文，深入讨论了知识创新的重要意义，并系统地阐述了如何具体有效地实施知识创新。

民进中央的主要领导很关注胡军关于知识创新方面的研究成果，现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常务副主席的罗富和仔细看过他的论文，觉得很好，让自己的秘书据此进一步锤炼，将最终报告呈交国务院。

胡军收到了来自中央的反馈，知道领导已经读了自己的文章。“但是之后这篇论文能产生多大实际影响呢？很难说。”

他认为，现代社会和农业社会最大的区别，在于每次技术革命之前都要经过漫长的知识理论积淀过程。他深知发展创新非朝夕之功，但仍然希望能通过发表论文、参加研讨会，用“适当的、温和的办法来做一些工作”。

“我想要打破坚冰。”胡军说。

### 自得

涉身时务，胡军有时显得悲观。面对自我的时候，他更积极，试图在矛盾中寻求一种自得。

去年12月，胡军作为民进中央文化艺术委员会主任，到福州进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研。工作结束后，大家一起唱歌，其中不乏总政歌舞团的专业歌唱家。胡军作为一个歌唱爱好者，拿起话筒就唱《我的太阳》，底气十足，一点不露怯。

退休后，胡军的办公室里物资渐少，但笔墨纸砚就搁在那儿，他在废旧的报纸上练字打发时间，写完就扔。

在中华书画家协会主席陈养群看来，胡军的字中融入他的哲学和宗教学养，字的点画结构颇有讲究，“现在看他的字，我都会感到吃惊，他的字中有他的风骨。”陈养群在与胡军交往的过程中，亦受到启发，从哲学的角度去观照绘画。“过去我画石头，就是简单一笔。受到胡军先生所说的‘哲学思想’启发后，我会从三面去画石头，展现它的立体感和光的透视。”

胡军自称对音乐和练字的爱好并无特殊的缘由。任何令他感兴趣的事情，他都禁不住想要去学，而且会坚持做下去。他的选择标准很简单，“它打动了我，打动我之后我也就永远放不下”。

年少时他便爱读书，最开始是文学，果戈里的小说，郭沫若的文集、剧本，普希金的诗歌，刘白羽的散文，他说不

出为什么喜欢，“有时候读到某一节，突然就被打动了”。当时城隍庙的旧书店离他家很近，他把所有的零花钱都拿来买书。

母亲爱哼几句越剧，他觉得“有意思”，就喜欢上了，专门买一本汤雪耕撰写的《怎样练习唱歌》一书自学唱歌。知青时代，农闲时，在宽阔的农田里，他放声唱歌，如《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送别》，这在拥挤逼仄的上海棚户区是绝不可能的事，那就是下乡生活赋予他的最大的自由。

现在，胡军辗转于各项社会活动，难以抽身。他喜欢独处，不爱学术和艺术之外的社交，认为那是浪费时间，但是一些职务和事务推不掉。“有空我可以自己写字、唱歌、打篮球，可以拔草浇花，看看我家里的葡萄、紫藤，挺好的。”

他自认有“老上海”守规矩的特点，不喝酒，不打牌，不喝茶，不抽烟，对于功利更没有强烈的欲望。“我母亲没有教给我什么远大的理想和抱负，我做一切事情都是出于自己内心深处强烈的兴趣与爱好。”

不久前，胡军去解放军军乐厅欣赏交响音乐会，听到捷克作曲家德沃夏克创作的大提琴曲《寂静的森林》，他内心受到很大的震动。当天晚上他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有来生，我一定要买一把大提琴。（文/离退休工作部学生记者 廖垠雪、姜子莹）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山石

## 学者谈读书

### 李书磊：读书是一种生存方式

关于读书，我能向比我更年轻的人们说些什么呢？我不愿再说些囊萤映雪的故事，那已成为有口无心的套话；我也不想像鲁迅那样作出“不读中国书”之类的断语，我知道向青少年作偏激语是危险的，他们往往信以为真。其实对于读书的看法从来就歧异纷纷。有人说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有人则说耽于读书和思考是人的堕落；历史上的许多大英雄是从来不读书的，如刘邦项羽，但也有不少伟大人物却嗜读如命，如列宁毛泽东。对于文人学者来说，读书是立身之本，常被视为胜业，所以杜甫说“读书吾家事”；不过他们之中也不乏自轻自贱者，说是“寻章摘句老雕虫”、“百无一用是书生”。究竟如何，全凭各人的慧根、缘份和信仰。我在这里所能说的只是我自己的经历和选择。

我是在艰难的环境中开始读书的。我生于乡村，少时家贫，吃饭都勉强；我至今也说不清是什么契机引发了我对读书如此强烈的欲望，我没上学时就求哥哥教我识字，未及学龄就进了学校。

学校离家二里多路，我因年幼甚至不能一口气走完，中间得停脚歇一歇再走。记忆中星期天必坐在屋后的树荫里看书，看着看着树荫就变成了太阳地，就再找树荫；就这样逐着树荫走，一看就是一天。有时看麦场，抱着书看得入迷了，谁家的鸡成群地啄食晾晒的粮食我也不知道，等路过的人用夸张的声音帮我赶鸡我才惶然惊醒。婶婶见我看书，总是问：“你看的是诗吧？”婶婶没文化，在她心目中诗是最了不起的；其实我是弄到什么书读什么书的，那时候能得到一本书是多么欢喜啊。常常一觉醒来觉得心中喜气洋洋，定神一想这喜事原来是又新借到一本书，可以在今天细细读来。那时候很多书都得偷读。有些书得瞒着老师和同学，如被批判过的《苦菜花》、《青春之歌》；有些书连家里人都得瞒，如《红楼梦》，十来岁时读这书毕竟心虚。所以直到今天我读书都有一种偷窃的快乐，读一本好书总有非份而得的暗喜。

十四岁那一年我进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我报这个系有一种幼稚的想头，我想我不考任何具体的专业，我将来要在图书馆里读遍所有专业的书，我要成为像亚里士多德、罗蒙诺索夫那样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入学后当然知道这很虚妄，但我还是兼修了中文、哲学、历史系的课。上大学时年纪小，尚不谙情爱，对班上的爱情事件浑然不觉，谁跟谁的许多故事都是我毕业很久以后才听说的，每每吃惊；当时只知道去图书馆看书。后来考取中文系研究生，加起来共在北大读书十年。我读书很庞杂且不太作计划，读什么书全凭那一时的内心渴望；我相信开卷有益，也相信凡是好书我都早晚得读，与其纳入计划读不如随兴所至地读，我认为书读多了在心中会自然地形成体系。十年勤读完成了我的专业教育，也完成了我的人格教育，我

在北大那个小小的湖边了解了世界和古往今来的人生。我知道读书决不仅仅是一个学者的职业活动，实际上读书使我经历了越来越丰富的灵魂生活，赋予我强大的精神力量，使我能够坦然面对那些为世间所贵、所畏的东西。

多少年来，读书成了我生存的基本方式。有时去餐厅吃饭，等菜的功夫我也不由得要到附近的书店买本书来读。现在很多朋友以赚钱为务，这很好；而我安于读书，这也很好。所谓的“时人不识余心乐”，各人有各人的乐趣，各人的乐趣都不足为外人道。圣人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我很理解，闻道、解惑、得新知的满足是难以言传的。当然我也酷爱旅行，但旅行也算是“读无字书”吧。

作者：李书磊

来源：微信公号 中国好书

## 老舍：我的读书方法

怎样读书，在这里，是个自决的问题；我说我的，没勉强谁跟我学。

第一，我读书没系统。借着什么，买着什么，遇着什么，就读什么。不懂

的放下，使我糊涂的放下，没趣味的放下，不客气。我不能叫书管着我。

第二，读得很快，而不记住，书要都叫我记住，还要书干吗？书应该记住自己。对我，最讨厌的发问是：“那个

典故是哪儿的呢？”“那句话是怎么来着？”我永不回答这样的考问，即使我记得。我又不是印刷机器养的，管你这一套！读得快，因为我有时候跳过几页去。不合我的意，我就练习跳远。书要是不服气的话，来跳我呀！看侦探小说的时候，我先看最后的几页，省事。

第三，读完一本书，没有批评，谁也不告诉。一告诉就糟：“嘿，你读《啼笑因缘》？”要大家都不读《啼笑因缘》，人家写它干吗呢？一批评就糟：“尊家这点意见？”我不惹气。读完一本书再打通儿架，不上算。我有我的爱与不爱，存在我自己心里。我爱念什么就念，有什么心得我自己知道，这是种享受，虽然显得自私一点。

再说呢，我读书似乎只要求一点灵感。“印象甚佳”便是好书，我没工夫去细细分析它，所以根本便不能批评。

“印象甚佳”有时候并不是全书的，而是书中的一段最入我的味，因为这一段使我对这全书有了好感。其实这一段的美或者正足以破坏了全体的美，但是我不去管；有一段叫我喜欢两天的，我就感谢不尽。因此，设若我真去批评，大概是高明不了。

第四，我不读自己的书，不愿谈论自己的书。“儿子是自己的好”，我有个小女儿，女儿能不能代表儿子，就不得而知。“老婆是别人的好”，我也不敢加以拥护，特别是在家里。但是我准知道，书是别人的好。别人的书自然未必都好，可是至少给我一点我不知道的东西。自己的，一提都头疼！自己的书和自己的运气，好像永远是一对儿累赘。

第五，哼，算了吧。

作者：老舍

来源：微信公众号 中国好书

## 好文共赏

### 105岁杨绛逝世 “我们仨”终成绝响

著名文学家、翻译家杨绛先生于2016年5月25日凌晨一时十分逝世，终年105岁。

与辛亥革命同龄的杨绛先生出身名门，天赋文才，不仅在文学上开辟了自己的一方天地，还与因与文史大家钱钟书的美好婚姻而备受艳羡。钱钟书生前曾称其“最才的女，最贤的妻”。

**名门闺秀：一星期不读书，一星期都白活**

杨绛祖籍江苏无锡，1911年7月17日出生在北京一位开明的知识分子家中，未满百日，便随父母南下，移居上海。少年时代，杨绛在上海读书。从小就学习好，但最淘气顽皮，曾因为上课说话被罚站示众，却因不服两人说话只罚一人而大哭到下课。在苏州东吴大学求学时，杨绛是班上的“笔杆子”，中英文俱佳。

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学养深厚，早年留日，后成为江浙闻名的大律师，做过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辛亥革命前夕，杨荫杭于美国留学归来，到北京一所法

政学校教书。1911年7月17日，杨绛在北京出生，取名季康，小名阿季。

杨绛排行老四，在姐妹中个头最矮，爱猫的父亲笑说：“猫以矮脚短身者为良。”杨绛八岁回无锡、上海读小学，12岁，进入苏州振华女中。

在父亲的引导下，她开始迷恋书里的世界，中英文的都拿来啃，读书迅速成为她最大的爱好。一次父亲问她：“阿季，三天不让你看书，你怎么样？”她说：“不好过。”“一星期不让你看呢？”她答：“一星期都白活了。”

1928年，杨绛17岁，她一心要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清华招收女生，但南方没有名额，杨绛只得转投苏州东吴大学。费孝通与杨绛在中学和大学都同班，有男生追求杨绛，费孝通便对他们说：“你们‘追’她，得走我的门路。”

**最贤的妻：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



钱钟书和杨绛

1932年初，东吴大学因学潮停课，开学无期。杨绛东吴大学政治学系毕业在即，不能坐等，就想到燕京大学借读，借读手续由她的同学孙令衔请费孝通帮忙办理。2月下旬，杨绛等5人北上。路上走了3天，到北平已是2月27日晚。他们发现火车站上有个人探头探脑，原来是费孝通，他已是第3次来接站，前两次都扑空。入学考试结束后，杨绛便急着到清华大学去看望老朋友，同伴孙令衔也要去清华看望表兄。这位表兄不是别人，正是钱锺书。

杨绛初见钱锺书，只见他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底布鞋，戴一副老式眼镜，浑身儒雅气质，“蔚然而深秀”。而杨绛更有一番神韵。她个头不高，但面容白皙清秀，身材窈窕，性格温婉和蔼，人又聪明大方。匆匆一见，甚至没说一句话，彼此竟相互难忘。

然而，孙令衔莫名其妙地告诉钱锺书，说杨绛有男朋友，又跟杨绛说，他表兄已订婚。钱锺书写信给杨绛，约她相会。见面后，钱锺书开口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说：“我也没有男朋友。”从此他们开始了书信往来。

一天，费孝通来清华大学找杨绛“吵架”。费孝通认为他更有资格做杨绛的男朋友，因为他们已做了多年的朋友。费孝通此前曾问杨绛：“我们做个朋友可以吗？”杨绛说：“朋友，可以。但朋友是目的，不是过渡；换句话说，你不是我的男朋友，我不是你的女朋友。”这回，杨绛的态度还是没变：“若要照你现在的说法，我们不妨绝交。”费孝通很失望也很无奈，只得接受现实，跟杨绛做普通朋友。

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1935年7月13日，钱锺书与杨绛在苏州庙堂巷杨府举行了结婚仪式。多年后，杨绛在文中幽默地回忆道：

“（《围城》里）结婚穿黑色礼服、白硬领圈给汗水浸得又黄又软的那位新郎，不是别人，正是锺书自己。因为我们结婚的黄道吉日是一年里最热的日子。我们的结婚照上，新人、伴娘、提

花篮的女孩子、提纱的男孩子，一个个都像刚被警察拿获的扒手。”

随后，钱锺书考取了中英庚款留学奖学金，杨绛毫不犹豫中断清华学业，陪丈夫远赴英法游学。满腹经纶的大才子在学习上却出奇地笨手笨脚，学习之余，杨绛几乎揽下生活里的一切杂事，做饭制衣，翻墙爬窗，无所不能。

杨绛在牛津“坐月子”时，钱锺书在家不时闯“祸”。台灯弄坏了，“不要紧”；墨水染了桌布，“不要紧”；颧骨生疔了，“不要紧”事后确都一一妙手解难，杨绛的“不要紧”伴随了钱锺书的一生。“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最才的女，最贤的妻”，这是钱锺书曾写给杨绛的“赠语”。

钱的母亲感慨这位儿媳，“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锺书痴人痴福。”

1979年4月，中国社会科学院代表团访问美国，钱锺书和费孝通作为代表团成员，不仅一路同行，旅馆住宿也被安排在同一套间，两人关系处得不错。钱锺书想想好笑，淘气地借《围城》里赵辛楣曾对方鸿渐说的话，跟费孝通开

玩笑：“我们是‘同情人’（指爱上同一个人）。”

钱锺书去世后，费孝通拜访杨绛，杨绛一语双关：“楼梯不好走，你以后也不要再‘知难而上’了。”

### 最才的女：与钱钟书“势均力敌”的大家



才女杨绛

难得的是，杨绛在文学史上的身份，不止是钱锺书的妻子，更是著名作家、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用时下流行的话说，杨绛和钱锺书，有着世间罕有的“势均力敌”的爱情。

“你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在一九四九年时完全可以离开内地的，为什么留下了呢”的问题，答道：“很奇怪，现在的人连这一点都不能理解。因为我们

爱我们的祖国。当时离开有三个选择，一是去台湾，二是去香港，三是去国外。我们当然不肯和一个不争气的统治者去台湾；香港是个商业码头，我们是文化人，不愿去。”“很多外国人不理解我们，认为爱国是政客的口号。政客的口号和我们老百姓的爱国心是两回事。我们爱中国的文化，我们是文化人。中国的语言是我们喝奶时喝下去的，我们是怎么也不肯放弃的。”这确是老一代知识分子的心里话。

上海于当年五月获得解放。这时，杨绛、钱钟书已接到清华大学的聘函。据说，北平和平解放后，他们两人的老友吴晗和钱俊瑞受中共中央委托，对北大、清华实行接管工作。随后，吴晗被任命为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聘请杨绛夫妇担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出自吴晗的主意。

1953年，杨绛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主要文学作品有《洗澡》、《干校六记》，另有《堂吉诃德》等译著，2003年出版回忆一家三口数十年风雨生活的《我们仨》，96岁又成书《走到人生边上》。



### 《洗澡》

本书是杨绛一部描写解放后知识份子第一次经受思想改造的书。主要描写的是解放后知识分子第一次经受的思想改造，即三反运动，又称“脱裤子，割尾巴”。这些知识分子耳朵娇嫩，听不惯“脱裤子”的说法，因此改称“洗澡”。杨绛女士将知识分子这一群体的内心世界、外貌形象刻画得惟妙惟肖。书情节生动，文笔简练，富有生活气息，反映了那个年代以及那个年代的人们真实的思想壮志。本书语言简洁、内容丰富、通俗易懂，是一本了解解放后知识份子的思想感情读物。《洗澡》不是由一个主角贯连全部的小说，而是借一个政治运动作背景，写那个时期形形色色的知识分子。所以是个横断面；既没有史诗性的结构，也没有主角。本书第一

部写新中国不拘一格收罗的人才，人物一一出场。第二部写这些人确实需要“洗澡”。第三部写运动中这群人各自不同的表现。“洗澡”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原因是谁都没有自觉自愿。假如果说，人是有灵性、有良知的动物，那么，人生一世，无非是认识自己，洗炼自己，自觉自愿地改造自己，除非甘心与禽兽无异。但是这又谈何容易呢？这部小说里，只有一两人自觉自愿地试图超拔自己。读者出于喜爱，往往把他们看作主角。



干校六记

“六记”的首记是“下放记别”，写下放干校的别离之情，带出政治运动对人性和生命的残害。1969年11月，杨绛本来打算和钱钟书吃一顿寿面，庆祝钱钟书的虚岁六十岁生日，但等不到

生日，钱钟书就得下放了。次年七月，杨绛也下放干校。送别钱钟书，有杨绛和女儿、女婿；杨绛下放时，就只有女儿一人送她，女婿得一已在一个月前自杀。得一因为不能捏造名单害人，含恨自杀。火车开行后，车窗外已不见女儿的身影。杨绛这样写：“我又合上眼，让眼泪流进鼻子，流入肚里。”

第二记是“凿井记劳”。杨绛被分配在菜园班，每天早出晚归，集体劳动，又参与掘井的工作，产生了“合群感”，从而有“我们”和“他们”的分别。

“不要脸的马屁精”、“雨水不淋，太阳不晒的”、“摆足了首长架子的领导”，是“他们”；“我们”则包括各派别、受“我们”看管的人。这种阶级感情，不是基于各人的阶级背景，而是基于人性。但在贫下中农的眼中，“我们”又变成了“他们”，农民对干校学员都很见外，还常常把他们种的菜和农作物偷去。这种对农民的轻轻讽刺，当然是在文革事过境迁之后才能宣之于口的。

第三记是“学圃记闲”。在干校的工作其实不太艰苦，就是单调，或者是担屎挑粪等知识分子从来不会主动接触的劳动。杨绛专管菜园，菜园距离钱钟书的宿舍不过十多分钟的路。钱钟书看

守工具，杨绛的班长常派她去借工具，于是，“同伴都笑嘻嘻地看我兴冲冲走去走回，借了又还。“钱钟书的专职是通信员，每天下午要经过菜园到村上的邮电所。“这样，我们老夫妇就经常可在菜园相会，远胜于旧小说、戏剧里后花园私约会的情人了。”他们在风和日丽时，就同在渠岸上坐一会儿，晒晒太阳；有时站着说几句话就走。钱钟书平日三言两语，断续写就的信，就在这这时亲自交给杨绛。杨绛陪钱钟书走一段路，再赶回去守菜园，“目送他的背影渐远渐小，渐渐消失。”传统戏曲中的才子佳人相会后花园，在这里有了新的演绎。

第四记是“小趋记情”。“小趋”是一头黄色的小母狗，在人与人之间难以建立互信的日子，与狗倒能发展出一段真挚的感情。这头瘦弱的小狗，因为得到杨绛和钱钟书的一丁半点食物救济，就成为他们忠实的朋友。后来干校搬家，狗不能带着走。有人传话说，他们走后，那小狗不肯吃食，又跑又叫，四处寻找。钱钟书说，那狗也许“早变成了一堆大粪了”，杨绛则认为，“也许变成一只老母狗，拣些粪吃过日子，还要养活一窝又一窝的小狗。”人与狗的境况何其相似？

第五记是“冒险记幸”，记三次冒险的经历。其中一次，杨绛在满地烂泥的雨天只身奔去看钱钟书。荒天野地四水集潦，几经磨难，冒险过河，总算到了钱钟书的宿舍门口，钱钟书大感惊讶，急催杨绛回去，杨绛也只是逗留一会，又只身而返，路上的危险也就自不待言了。杨绛这种“私奔”，当中包含了多少情意？这种情意用平常的语调道出，也就更见深厚了。

第六记是“误传之妄”。一次钱钟书听闻自己将获遣送返京，结果只是谣传。杨绛自然十分失望，她想到去留的问题，便问钱钟书，当初如果离国，岂不更好，钱钟书斩钉截铁的说不，他引柳永的词自喻，就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幸而二人最后还是一起获准返回北京。

《干校六记》的书名和篇目，都源自清乾隆、嘉庆年间沈复的《浮生六记》。《浮生六记》记述作者的日常生活琐事，以及与其妻芸娘的缱绻情深，其中《闺房记乐》和《闲情记趣》两章，均为世人乐道。钱钟书在书前小引说：“‘记劳’，‘记闲’，记这，记那，那不过是这个大背景的小点缀，大故事的小穿插。”值得注意的是，本书如何以小点缀反映大背景，以小穿插说出大故事，

这也是阅读本书的趣味所在。文革期间，政治混乱，批斗无日无之。在政治的最上层，这本来就是一场夺权的运动，弥漫全国的，就是互相猜疑、互打报告，乃至文攻武斗的一种局面。在这场运动中，人性的尊严不但尽失，也受到了极大的扭曲，可以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惨痛的一页血泪史。但我们读《干校六记》，却读不到对这种不合理现象的强烈控诉和谴责，字里行间只是平和的语调，或顶多是一点点淡淡的无奈和婉转的讽刺。只是，在仔细咀嚼后，也许会尝出一点辛辣的讽刺意味。

这部作品，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学“怨而不怒”的宗旨。杨绛和钱钟书的遭遇，虽然比不少受批斗的知识分子要好得多，但到底是一种屈辱，也是人才的浪费，杨绛谈到这段经历，并没有激情的呐喊。虽然说作者怨而不怒，但在字里行间，还是对人性的丑恶有所讽刺，每多言外之音。如“小趋记情”一章，隐然处处以狗和人相对照，人不如狗的婉讽跃然欲出。那种乱世中人与狗互相依傍的情意，也令人感动。又如“凿井记劳”一章，对农民似有所不满，但如果认为这就是对农民或“农民性”的鄙视，无异落入“唯阶级论”的窠臼。作

者想说的，其实是人的贤愚好坏，并不应由其出身阶级等先天因素来决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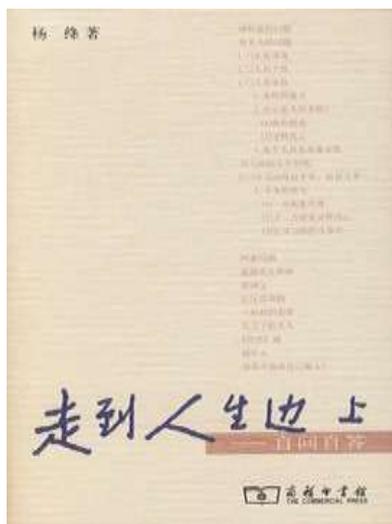
此外，书中写夫妇之情十分细腻，这种情，也是在字里行间表达，而没有甚么激情的爱的宣言。在这六记中，杨绛处处显出对钱钟书的关怀和了解，在“冒险记幸”中，为了见钱钟书一面，杨绛便不惜冒上生命的危险，在回忆中这些险境都写得稀松平常，但如果设身处地，回到当时境况，命悬一线的险状，其实令人不寒而栗。



《将饮茶》

这本散文集包括三类内容，第一类为回忆父亲杨荫杭和三姑杨荫榆的文章，第二类为详述钱钟书创作《围城》的背景及情形的文章，第三类为描写“文革”时期种种遭际的文章。作者以细腻传神而又幽默风趣的文笔记人叙事，活画出了人物形象也绘描出了时代

氛围，使全书在貌似轻松恬然中富于深刻隽永的人生意蕴和探赜索隐的史料价值。



《走到人生边上》

《走到人生边上》是杨绛女士在 96 岁高龄之时著作，思路缜密，文笔优美，内蕴激情，是不可多得的佳作。此书共分为两部分，在书中杨绛女士关注了神和鬼的问题，人的灵魂、个性、本性，灵与肉的斗争和统一，命与天命以及人类的文明等问题。融会了文学、哲学、伦理学精神分析等学科的知识，并形成了自己的思考。后一部分则由注释《写在人生边上》多篇散文构成。在《论语趣》一文中，杨绛女士提到，钱钟书先生和她都认为，孔子最喜欢的弟子是子路而不是颜回，最不喜欢的是不懂装懂、大胆胡说的宰予。

在杨绛任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期间，杨绛还译有《1939 年以来的英国散文选》、西班牙著名流浪汉小说《小癞子》，法国勒萨日的长篇小说《吉尔·布拉斯》。1978 年，八卷本《堂·吉珂德》横空出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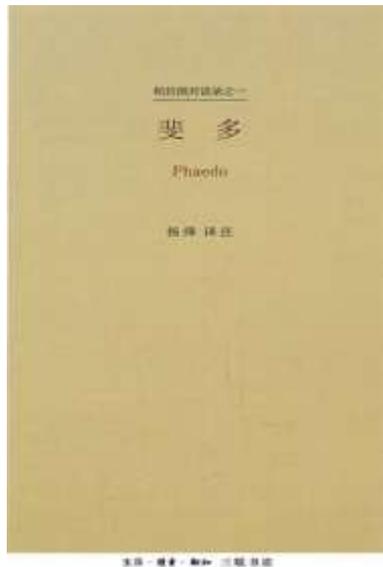
《小癞子》

在清华初期，杨绛翻译出版了西方文学史上首部流浪汉小说——《小癞子》。杨绛翻译的《小癞子》最初是根据法译本转译的，中译本于一九五〇年由上海平明出版社初版，后多次重印，至一九六〇年，杨绛又重新修订。十年动乱结束后，杨绛又根据富尔歇·台尔博斯克校订的一九五八年版西班牙原文本重新翻译，一九七八年七月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一九八三年后，杨绛又根据新版本重译，使译本日臻完善。



《堂吉诃德》

杨绛本身通晓英、法两国语言，为使《堂吉诃德》翻译得更准确，她又学习了西班牙语，并最终在文革中将书稿保护下来。杨绛《堂吉诃德》译本被公认为优秀的翻译佳作，迄今已累计发行70万册，是该书译本当中发行量最多的译本。1978年《堂吉诃德》中译本出版时，正好西班牙国王访问中国，邓小平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西班牙国王。特别是这个译本文字流畅，注释详尽，不仅受到我国读者的广泛欢迎，而且还得到西班牙方面的赞誉，杨绛也因为翻译该书的贡献而荣获西班牙国王颁发的骑士勋章。



《斐多》

杨绛先生的译文，对照多种版本和注释，并一句句死盯着英译本，而力求通达流畅。她认为：“苏格拉底和朋友们的谈论，该是随常的谈话而不是哲学论文或哲学座谈会上的讲稿，所以我尽量避免哲学术语，努力把这篇盛称语言生动如戏剧的对话译成戏剧似的对话。”她在前言中说：“人名地名等除了个别几个字可意译，一般只能音译。一个名字往往需用许多字，这一长串毫无意义的字并不能拼出原字的正确读音，只增添译文的涩滞，所以我大胆尽量简化了。不过每个名字不论简化与否，最初出现时都附有原译的英文译名。”

牛棚岁月：我们老夫妇经常可在菜园相会



相依为命的十年

1966年“文革”爆发，杨绛在外国文学研究所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揪出来”。从此开始了受污辱、受践踏、挨批、挨斗的日子。造反派给她剃了“阴阳头”，派她在宿舍院内扫院子，在外文所内打扫厕所，住“牛棚”。余下的时间作检讨、写认罪书等等。3天后，钱锺书也被打成“牛鬼蛇神”。

1969年11月，钱锺书被下放到信阳地区罗山县。次年7月，杨绛也被下放到那里，被分配在菜园干活。菜园距离钱锺书的宿舍不过10多分钟的路。当时，钱锺书负责看守工具，杨绛的班长常派她去借工具，于是，“同伴都笑嘻嘻地看我兴冲冲走去走回，借了又还”。后来，钱锺书改任专职通讯员，每次收取报纸信件都要经过这片菜园，夫妇俩经常可以在菜园相会。“这样，我们老夫妇就经常可在菜园相会，远胜于旧小

说、戏剧里后花园私约会的情人了。”

当时钱钟书在邮电所，帮助那里的工作同志辨认难字，寻出偏僻的地名，解决不少问题，所以很受器重，经常得到茶水款待。当地人称煮开的水为“茶”，款待他的却真是茶叶沏的茶。那位同志透露了一个消息给他。据说北京打电报给学部干校，叫干校遣送一批“老弱病残”回京，“老弱病残”的名单上有他。

杨绛喜出望外。她想：“默存若能回家，和阿圆相依为命，我一人在干校就放心释虑；而且每年一度还可以回京探亲。当时双职工在息县干校的，尽管夫妻不在一处，也享不到这个权利。”

过了几天，他从邮电所领了邮件回来，破例过河来看杨绛，特来报告她传闻的话：回北京的“老弱病残”，批准的名单下来了，其中有他。

杨绛已在打算怎样为他收拾行李，急煎煎只等告知动身的日期。过了几天，他来看她时脸上还是静静的。她问：

“还没有公布吗？”

公布了。没有他。他告诉杨绛回京的有谁、有谁。杨绛的心直往下沉。没有误传，不会妄生希冀，就没有失望，也没有苦恼。

杨绛陪丈夫走到河边，回到窝棚，目送他的背影渐远渐小，心上反复思忖。难道自己的丈夫比别人“少壮”吗？她背诵着韩愈《八月十五夜赠张功曹》诗，感触万端。她想到了他档案袋里的黑材料，肯定是这份材料在作祟！

杨绛想起这事仍然心上不服。过一天钱钟书到菜园来，杨绛就说：“必定是你的黑材料作祟。”他说无聊，事情已成定局，还管它什么作祟。杨绛承认自己无聊：妄想已属可笑，还念念在心，洒脱不了。

回家的是老弱病残。老弱病残已经送回，留下的就死心塌地，一辈子留在干校吧。杨绛痛苦地联想着。

一天，钱钟书路过菜园，杨绛指着窝棚说：

“给咱们这样一个棚，咱们就住下，行吗？”

钱钟书认真想了一下说：“没有书。”

杨绛认同：真的，什么物质享受，全都舍得；没有书却不好过日子。他箱子里只有字典、笔记本、碑帖等等。

杨绛问：“你悔不悔当初留下不走？”

钱钟书说：“时光倒流，我还是照老样。”

在杨绛眼里，钱钟书向来抉择很爽快，好像未经思考的；但事后从不游移反复。而自己则不免思前想后，可是两人的抉择总相同。既然是自己的选择，而且不是盲目的选择，到此也就死心塌地，不再生妄想。

一九七二年三月，在周恩来总理的特别关照下，杨绛和钱钟书作为这一年的第一批“老弱病残”人员，离开干校，回到了阔别两年的北京。据说周恩来调钱钟书回京是以参加毛泽东诗词的英译工作为名，主要目的是怕他下放干校受折磨而死。

即便动荡年月，杨绛也没有放弃学术研究，通晓英、法两国语言的杨绛，近60岁时，从零开始学习西班牙语，并翻译了《堂·吉珂德》，至今都被公认为佳作，已累计发行近百万册，是该书译本当中发行数最多的。

“文革”结束后，杨绛和钱锺书获得了自由，终于又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中。浪费了整整10年的光阴，他们决定整天闭门自守，什么地方也不去，沉溺于自己的学问事业。

**打扫现场：我的生平杰作就是一个钱瑗**



我们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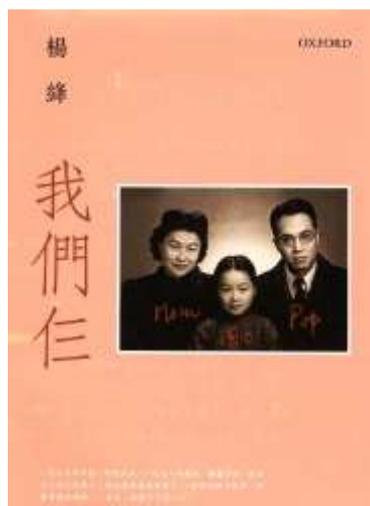
也许在很多人看来，与钱、杨二先生相比，作为女儿的钱瑗实在是太普通了。直到杨绛的《我们仨》面世之后，爱女钱瑗才始为公众所知——她外语才能精湛，学识渊博，目光敏锐坚定，在大学任教时便勇于创新，开创了“实用外语文体学”。在杨绛眼里，“我的生平杰作就是一个钱瑗”。

因肺癌转脊椎癌，钱瑗 1997 年去世。还没有从丧女的悲哀中解脱，翌年 12 月，相伴了 60 多载的丈夫钱锺书又离她而去。遵循钱锺书遗嘱，后事一切从简。杨绛一直陪送钱锺书的遗体到焚化炉前，久久不肯离去，难舍难分。

两年间失去了两个至亲之人，只留下 87 岁高龄的杨绛孑然一身。这个打击几乎致命，但她以那羸弱的身躯挺过来了。这让杨绛对生、老、病、死有了透彻的领悟，希望自己能够“死者如生，

生者无愧”（钱锺书语）。家里的一切都保持女儿和丈夫在世时的旧样。

晚年，杨绛开始“打扫现场”，以惊人的毅力整理钱锺书的手稿书信，钱锺书的手稿多达 7 万余页，涉猎题材之广、数量之大、内容之丰富，令人惊叹。手稿多年随着主人颠沛流转，从国外到国内，由上海至北京，下过干校，住过办公室，历经磨难，伤痕累累。纸张大多发黄变脆，有的已模糊破损、字迹难辨。重重叠叠，整理起来十分辛苦。2003 年，《钱锺书手稿集》（影印本，40 卷）能及时与读者见面，杨绛功不可没。几年来，杨绛以全家 3 人的名义将高达数百万元的稿费 and 版税全部捐赠给母校清华大学，设立“好读书”奖学金。



《我们仨》

最初设想，这本书一家三口各写一部分，钱瑗写父母，杨绛写父女俩，钱钟书写他眼中的母女俩。到 1996 年 10 月，钱瑗已经非常衰弱，预感自己的日子不多了。她请求妈妈，把《我们仨》的题目让给她写，她要把和父母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写下来。躺在病床上，钱瑗在护士的帮助下断续写了 5 篇，最后都不能进食了，还在写。杨绛见重病的女儿写得实在艰难，劝她停一停。这一停，就再没有能够重新拿起笔。钱瑗最后一篇文章落的日期是 1997 年 2 月 26 日，她去世的前 6 天。女儿去世后，杨绛将残稿接手，续写完属于“他们仨”的故事。

《我们仨》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中，杨绛以其一贯的慧心、独特的笔法，用梦境的形式讲述了最后几年中一家三口相依为命的情感体验。第二部分，以平实感人的文字记录了自 1935 年伉俪二人赴英国留学，并在牛津喜得爱女，直至 1998 年钱先生逝世 63 年间这个家庭鲜为人知的坎坷历程。他们的足迹跨过半个地球，穿越风云多变的半个世纪：战火、疾病、政治风暴，生离死别……不论暴风骤雨，他们相濡以沫，美好的家庭已经成为这一家人生最安全的庇护所。天上人间，阴阳殊途，却难断挚情。

杨绛独伴青灯，用心灵向彼岸的亲人无声地倾诉着。作为老派知识分子，她的文字含蓄节制，那难以言表的亲情和忧伤弥漫在字里行间，令读者无不动容。生命的意义，不会因为躯体的生灭而有所改变，那安定于无常世事之上的温暖亲情已经把他们仨永远联结在一起，家的意义也在此书中得到了尽情的阐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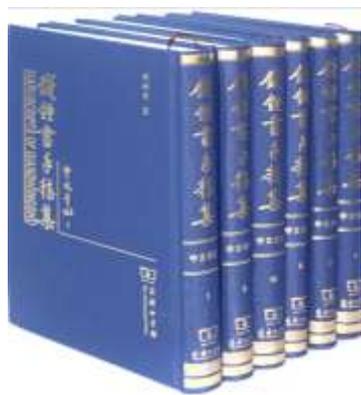


《容安馆札记》

1953 年，钱钟书先生居住在中关村小平房（引用陶渊明《归去来辞》“审容膝之易安”）。当时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并负责外文研究所事宜。1953 年院系调整，清华改为工科大学，文科部分并入北京大学。钱锺书摆脱教务，在文学研究所工作，极少发表作品，以静静读书为主。以后屡次迁居，当时中关村小平房成为钱钟书“容膝易安”的住所，所以日札也就取名为“容安馆札记”了。

钱钟书逝世后，尚有大量的珍贵材料保留在未付梓的读书笔记之中，这些笔记反映了一位著名学者一生的读书思考过程。杨绛以高龄之躯将亡夫浩瀚的笔记一点点整理出来，公之于众，其中《容安馆札记》以读书时的感想和思考为主要内容，是研究钱氏思想的重要材料，其中有一些观点后来经钱先生发挥，写成了专著，也有的内容当年先生有意扩展，终没有来得及做完。从笔记内容看，钱先生读书涉猎极广，除经史子集外，民俗俚语乡间野史，凡能搜集到的无所不读，凡读过的又无一不做笔记。

据杨绛先生说，钱钟书先生做笔记的习惯是在牛津大学读书时养成的。因为该大学图书馆的书从不外借，故钱先生只得用铅笔边读边记。还有一些笔记是用毛笔写成的，显然是他后来“反刍”（杨绛语）追记的。



《钱钟书手稿集》

这部《中文笔记》展示钱钟书自1930、1940年代至1990年代各时期中文笔记原貌。按时序，这部分中文手稿被钱钟书夫人杨绛编为9本残页、25本大本、38本硬皮本和11本小本，凡83本，涉及3000种以上中文著作及少量外文著作。

笔记中不仅包括了《诗经》、《论语》、《史记》、《全唐诗》、《全宋词》、《红楼梦》等经典，更大量涉及历代文人诗文别集、笔记小说、野史杂谈、尺度日札。多种形制、各类语体的读数笔记曾伴随钱钟书走南闯北，历经风雨。

据引述杨绛的话，这些笔记本本来包含有钱钟书的日记和读书笔记。在“文革”期间，夫妇俩把日记从本上一条条剪下。居无定所时，杨绛用枕套、麻袋装上这些笔记本，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没丢掉一本。

钱钟书辞世前曾说，这些笔记都没用了。但杨绛不同意，“他（钱）一生孜孜矻矻积聚的知识，对于研究他学问和研究中外文化的人，总该是一份有用的遗产”。

### 闭门谢客：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在许多朋友眼里，杨绛生活异常俭朴、为人低调。她的寓所，没有进行过任何装修，水泥地面，非常过时的柜子、桌子，老旧的样式，始终安之若素，室内没有昂贵的摆设，只是浓浓的书卷气。杨绛说：“我家没有书房，只有一间起居室兼工作室，也充客厅，但每间屋子里有书柜，有书桌，所以随处都是书房。”

杨绛期颐之年仍笔耕不辍，每天伏案工作。有一年，她的新著出版，出版社有意请她“出山”，召开作品研讨会。对此，杨绛坦陈：“我把稿子交出去了，剩下怎么卖书的事情，就不是我该管的了。而且我只是一滴清水，不是肥皂水，不能吹泡泡，所以开不开研讨会——其实应该叫做检讨会，也不是我的事情。读过我书的人都可以提意见的。”她谢绝出席。

闭门谢客的杨绛过着一个普通老人的生活，耳朵有些背，视力也下降了。她曾对记者说：“最大的问题就是打扰特别多，尤其是电话太多，我真担心自己的时间是不是就这样被消耗掉。你不能代我转达给那些想来采访或看望我的朋友们，杨绛谢谢他们的关心，但千万不要过来看我。你想，即使大家来了，就算同我聊了一天，又能怎么样？我们也不可能只凭这一天交谈就成了朋友吧，还是请大家给我留些时间吧，那样我写些文章出来，大家看到后就权当写给大家的一封信吧。”

编辑：冯婧

来源：凤凰文化

## ■ 史苑钩沉

### 柳鸣九：《未名湖畔四年》

柳鸣九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终身荣誉学部委员，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南欧拉美文学研究室主任等职务。他一生潜心研究，甘于寂寞，淡泊名利，勤奋写作，可谓著译等身。1953年秋，柳鸣九先生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开始了四年勤勉而幸福的大学生活。在先生的娓娓道来中，我们仿佛看到了那些50年代的年轻人在燕园的奋斗与执着。

未名湖畔的四年生活，是柳鸣九先生心中最为宝贵的回忆。四年中，他在书本中汲取知识，在大师身旁聆听教诲，在社团活动中广交朋友、寻得爱好，晨光微露时起身、明星闪烁时睡去，园子里的每一分钟，都不能复得，都弥足珍贵。在《未名湖畔四年》中，我们找得到过去，看得见未来，因为这上面印有每一位北大学子的身影。

1953年初秋，得知自己考取了第一志愿北京大学西语系的那天，我欣喜若狂，如醉如痴，几乎从内心深处，喊出

了这样一个欢乐的心声：“我终于可以走出湖南了！”

显然，我对自己的家乡并无眷恋惜别之情，要知道，在这里，我的高中三年过得并不顺利舒畅，更因为我生性怕热，夏天的酷暑加上集体宿舍里的臭虫，使我的日子有点难熬，特别是高考的这一个夏天，夜不能眠的炎热，加上繁重的复习备考任务，更有如一场炼狱经历，直到好几十年后，我仍然多次做过第二天即将考试而我的数理功课还没有丝毫准备的噩梦。至于自己即将要去的北大，我并没有任何感性的认知，只知道那是中国的最高学府，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一个源泉，是名士精英汇聚的所在，要去这样一个地方，这就足以令人心潮澎湃、洋洋自得了。在北上的列车里，面对着眼前辽阔的华北大平原，我平生第一次有了一种自己似乎大了起来、高了起来的感觉。

#### 对司徒雷登心存感激

像我这样的外省学子，一跨进京师第一大学堂，自然更有山阴道上应接不

暇之感，不论从感官上，还是在精神上都是如此。这里使人感到美不胜收的事物实在太多了，而首先使我心醉着迷的便是燕园景色：西校门内绿茵茵草坪上的华表，未名湖畔的水光塔影、杨柳依依，临湖轩前的幽幽竹林与蜿蜒小径，还有燕东园、燕南园的人杰地灵、精美房舍……所有这一切，我都惊为“仙境”。在这里，汇集了典雅精致、雍容华贵、幽深宁静、中西合璧等诸种美趣。从我一进燕园的那天起，我便强烈地感到能在这样的校园里致学，本身就是一种幸福、一种自豪。说实话，这是我上北大的第一自豪感、第一骄傲感。事实上，在北大的四年，我整天浸染在这如诗如画的美景里。疲惫时，它能使我得到恬静的休息；低沉时，能从这里再获欣欣向荣的状态；遭到挫伤时，能比较快地得到修复与调整……也是从入燕园开始，我养成了散步的习惯，这个习惯一直陪伴着我，直到帕金森病使我走路日益蹒跚的今天。

燕园美景构园的喜爱与眷念是如此深切，寒暑假时，我从不回家乡探亲，而一直留在燕园里，既为了与她“寸步不离”，也为了在假期里给自己的文化学业多充一些电。而临近毕业时，一想到我将要告别燕园，我几乎感到一种莫

名的恐慌，即便是离开北大多年之后，我还不时地怀念起燕园，经常把它与我见过的清华园、武大珞珈山、美国的哈佛、法国的巴黎大学的校园相比较，我觉得没有一所学校的校园有燕园这么美。它甚至影响了我的中国近代史观，我对在中国辛劳多年经营出燕园这一片天地的美国人司徒雷登充满了好感与尊敬，甚至心存感激。

### 布衣低调乃为真名士

上北大使我倍感自豪的是，它作为中国精神文化的摇篮，曾经汇集了我所崇拜的思想文化先贤：从蔡元培到胡适到陈独秀……他们已经构成了近代中国文化学术史上的光辉一页，而从我进入学校的第一天起，就发现自己的眼前是当代中国学术文化难得一见的群星闪烁的风景区。开学典礼的那天，学校的领导与各系的系主任都列坐在民主楼大礼堂的主席台上，被一一介绍给入学的全体新生：校长马寅初，鼎鼎大名的经济学家；副校长汤用彤，著名的国学大师；教务长周培源，国际著名的物理学家；还有一批系主任，经济系的陈岱孙、化学系的黄昆、地质地理系的侯仁之、历史系的翦伯赞、中文系的杨晦、西语系的冯至、东语系的季羨林、图书馆系的

向达……无一不是闻名遐迩的学术权威、文化大家，坐在台下的我，翘首远望，目不转睛，盯着台上一个个现实中活生生的名家大师，的确有些心潮澎湃。于是，这场开学典礼对我来说，就成为了一场洗礼、一个激励、一次升华，它在我凡俗的躯体中，点燃了星星的一点立志成名成家的“圣火”。我之所以夸张地称之为“圣火”，是因为它在我此后的生命中，毕竟带来了一点“光”、一点“热”，如果我的有些作为还算得上是“光热”的话。

从我入北大后的感受来说，名家榜样的激励远远不止于入学典礼上，它几乎无处不在。一进入到系里，高年级同学就津津乐道这里似乎比其他系更为“星光灿烂”，除了冯至外，还有朱光潜、田德望、杨周瀚、李赋宁、吴达元、闻家驊、张谷若、吴兴华、盛澄华以及原本属于西语系，即将调入文学研究所的钱钟书、卞之琳、杨绛、潘家洵……这些人在青年学子心目中之所以闪闪发亮，要么是曾经在国外的名牌大学里获得了高学位，要么就是在著书立说、治学布道上已有了令世人瞩目的劳绩，从这些活生生的榜样里，我开始形成了明确而凡俗的人生观：成名成家是最有价值的人生之途，而成名成家的核心就在

于要有自己过硬的“本钱”。何为“本钱”？按我的理解，那就是文化学术实绩，就是一本本论著，就是一部部作品。在燕园如此强大的名家名师磁场中，我不仅很快确定了自己人生努力的方向，而且几乎无时无刻不感受到这磁场的魅力与感染。在未名湖畔，我经常看见陈岱孙绕湖散步，他轩然不凡的气宇，清高矜持的神情，悠悠自得的状态，使我对名师名家的精神意境有了具体的感受；我也经常看见骑着自行车的周培源风驰电掣在办公大楼与各个教学楼之间，特别是他上车与下车时的麻利动作，使我对名家的高效风格有了最初的概念与榜样；我也经常看见朱光潜，不是夹着书本去教室讲课，就是在体育馆附近慢跑或打太极拳，总是一身布衣，一点儿也不引人注目，但他那种布衣大师的形象，一直刻印在我的脑海中，成为日后仿效的参照……现在看来，这是我最初对名家风度的感受，从这些感受出发，我才有对名家风度的向往与仿效以至自己的身体力行。我把脱俗不凡、潇洒清高、高效有为、布衣低调认定为名家风度的基本元素与摹仿目标，而没有把抽烟、喝酒、熬夜、高谈阔论、写诗、着洋装或有意不修边幅视为名士风度的入门课，就像北大那时有些天才少年那

样……我对名士风度这样粗浅、朴素的认定与选向，使我终身受益，至少我从朱光潜那里学来的慢跑习惯，坚持了数十年之后，总算到七十八岁的高龄还有精力为出版社主编两大套书系。

### “满汉全席”般的课程设置

北大四年的生活带给我最具体、最明显的变化，当然要算是把我造就成了一个有专业文化和专业技能的人，这是我日后获得“饭碗”的基础，也是我建立并发展毕生志趣、积攒我的精神劳绩与文化成果的最初基础。我在北大学的是西语系法国语言文学专业，应该说，西语系的专业教育还是很成功的，至少是很完备的。首先，课程的设置很科学、很扎实。我所在的专业，法语课程的份量是很重的，整个四年没有一天没有法语课，每天少则三四节，多则七八节。授课教师都是当时国内最优秀、最资深的语言文化专家，绝大多数都曾长期留学法国，获得名牌大学高学位者比比皆是。一年级，由吴达元与齐香任我们的主课教师，吴是著名的法语语法家，他在课堂上的教学既得法又严格且严厉，“严师出高徒”，这大大有助于给我们打下坚实的法语语法基础。齐香是游学海外多年后归国的语言学家，法语语音

学与法兰西谈吐艺术是她的所长，其发音之准确，语调之优美，即使是法国人也深感钦佩。跟着他们两位当助手的则是年轻教师桂裕芳，也就是后来译有《追忆逝水年华》与《变》的著名翻译家，有他们三位每天对我们进行法语强度锤炼，整整一年下来，坚实的基础也就打下了，虽然我在课堂上没少看吴达元先生的脸色，但的确是获益良多，终生受用。

从二年级到四年级，法语主打课是精读，读的全是法国文学名著中原汁原味的经典篇章，授课的分别是三位对法国语言文学有专深修养的资深教授：李慰慈、李锡祖与郭麟阁。李慰慈的讲课以细腻深入见长，特能加深你对原著的深透理解。李锡祖是一位让我难忘的老师，他的幽默、他对同学的亲和态度与他天马行空像自由和风一样的讲课风格，使我觉得他在骨子里最具“法兰西风格”，虽然他总穿一身不起眼的布料中山装，而不像吴达元那样从来都是西装笔挺，头发严整油亮。李锡祖长于词汇学，每讲一个词，他总远远地从词根讲起，直讲到由此而来的种种结构上的变化、延伸以及时代历史所增添的内容，如此根茎蔓延，枝叶恣长，一个个词成了一簇簇文化景观。郭麟阁则学养深

厚，绝活颇多，他写得一手典雅的法文，他用法文写过一本《法语文学简史》，可惜时运不济，迟迟未能出版，出版后又影响不大，他的翻译本领也甚是了得，善于把中国的成语译成法文，北大西语系的《汉法成语词典》就是在他的主持下编写出来的。他在课堂上还有一绝，能闭上眼睛随口背出法国古典主义名剧中的大段篇章，其记忆的功力使我叹服。

除了主打的精读课始终贯彻四年外，到了三、四年级又增加了泛读课与翻译课。教泛读课的是法国语言文学界的资深教授曾觉之，他以渊博的文史学识见长。翻译课则前后由陈占元与盛澄华两位教授分别执教，陈占元是中国翻译界的元老，曾参与鲁迅与茅盾创建中国第一家文学翻译杂志《译文》的工作，早就有不少译作问世。盛澄华则是著名的纪德专家，成名甚早，在法国文学界以富有才情、风流倜傥而闻名。此外，还有由陈定民教授主持的口译课，陈教授更是一个鼎鼎大名的人物，建国初期，他一直是国家领导人会见外宾时或政府涉外高级会谈中的首席法语口译，但可惜的是，他因为外交出访任务出差而经常缺课。

既然是以培养外国语言文学的教学人才与研究人才为目标，西语系的教学设置中当然有很大一部分文学史专业课程。首先，文学史课程从一年级就开始有了，一直贯穿到四年级。头两年是全系各专业都要学的欧洲文学史课程，讲授者是李赋宁教授，后两年则是各专业自己的国别文学史课程，我们法文专业学的是法国文学史，授课老师是闻家驷。李赋宁与闻家驷都是西语系的名教授，享有很高的声誉。李赋宁既是造诣专深的英美文学学者，又对整个欧洲各国文学有广博的修养，他毕生最主要的学术成就是他所主编的三卷本《欧洲文学史》，在建国后半半个多世纪里，这要算外国文学研究领域里最令人瞩目的一部学术巨制了。闻家驷作为西语系资深教授的名声当时似乎不及他作为闻一多之胞弟的名声那么大，他后来则以雨果诗歌的译者与《红与黑》的译者而享有声誉。

同样是为了给学生打下专业文学史有深度的基础，还设有另一门课程，那是陈占元教授的巴尔扎克专论，安排在四年级，每周也有两节课，课时篇幅不小。由于陈占元曾游学巴黎多年，在法兰西文学氛围里浸染已久，学养深厚，他的视点、评述、材料与阐释都透出那

种文学原汁原味的自然气息，而不同于建国初期在外国文学领域里占主导地位的苏式庸俗社会学的观点。这三门课都是我当时特别感兴趣的，学得也很用心，很努力。在今天看来，我在编撰法国文学史方面还算得上取得了一些成就，我应该怀念我的先师对我的启蒙。

在冯至系主任的主持下，当时的西语系为了培养出一批既有国别语言文学的精良专业水平，又具有广泛的历史学科基础与修养的人文学科人才，的确在课程设置上下足了功夫，至少是作出了最周全的安排，似乎是要在把这批学生送出校门之前，使他们得到最完整的装备，真正“武装到牙齿”。除了以上两大板块的专业课程外，还设置了不少配合性、补充性的课程。众所周知，文学的产生与发展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框架里进行的，因此，历史不可不学。不仅要学专业语言文化所在的国别史，如法国史，而且还要学中国历史，这大概是为了防止西语系的学生产生“言必称希腊”，甚至“崇洋媚外”的倾向。再者，不同的文化是需要加以对照比较的，特别是从事外国语言文化的人，面对外国的语言文化，需要有本民族的文化知性与文化意识，为此就要学中国文学史，特别是五四以后的中国新文学史；还有

在中国从事外国文化工作必须经常通过自己本民族的语言文化的技能修养，因此打下良好的汉语写作基础至关重要，汉语写作、汉语修辞课程的设置也就很必要了，总之，我们也有幸享受了应有的文史大餐的服务。当然更不能忘记的是，西语系要培养的是“有政治觉悟”的“又红又专”的人才，而不是“白专”人才，于是，政治课就成为了贯穿四年的一条“红线”。总而言之，西语系的课程堪称丰富、周到、稳妥，这份课程设置与教学大纲显然是一批既精通中西语言文化又尊崇社会主义革命路线的教育专家煞费苦心的杰作。为了将青年学子喂大喂壮，他们不仅设置丰富如“满汉全席”般的佳肴大餐，而且让每一道大餐都由技艺高超的名师掌勺——中国现代文学史是王瑶，汉语修辞写作是杨伯峻，中国历史是田余庆……早在 50 年代，他们就都是北大著名的教授了。

### “上足了发条”的四年时光

北大西语系给了我一个文化专业以及这个专业所需要的各种职业技能，它给我提供的培育是全方位的、高质量的，可以说占尽了北大燕园里的“地利”与“人和”。那个时期，在北大校园里，努力为祖国学习，是压倒一切的中心任

务，燕园上空，响彻“向科学进军”口号的强音，青年学子们全神贯注、全力以赴在文化科学高地进取、攀登，那一番热烈、紧张、分秒必争的情景至今似乎历历在目。

每天规定起床的时间是六点半钟，但至少在我们这一班的宿舍里，提前起来者居多，贪睡的几乎没有，大家都要赶在早餐之前做完一节早操，更要利用那一个钟头进行晨读，特别是对学外语的学子来说，发声朗读与背诵更是晨读的必修功。晨读的程序完毕，每个人就背着书包出发了。先是要到大饭厅去用早餐，为此，书包里总要带上自己的饭具，一个搪瓷盆加一把匙，吃完早餐，自己把食具清洗干净，又放进书包随身携带着，就像战士随身携带着干粮。饱餐之后的出发，如同在军号声中的进军，从一块阵地转战另一块阵地，对我们西语系的学生来说，一般都是辗转于外文楼、文史楼与哲学楼之间。每两堂课之间的休息时间非常短暂，你得背着书包从这幢楼赶到那一幢楼，就像赶场子一样紧张。整个上午就这样过去了。中午用餐与午休时间也不宽裕，你迟了一步、慢了一点，时间就很紧迫了，往往就要使你的午睡时间打折扣，而午睡没有保证，下午听起课来就会昏昏沉沉了，因

为每天夜里的睡眠并不充分，下午的课也并不少。全部课完毕后，就到了一个小时的体育锻炼时间，如果你要保证自己有良好的睡眠与食欲以支持你每天紧张的学习，这一个小时的体育锻炼是必不可少的。当你锻炼得大汗淋漓之后，又得赶快奔赴大饭厅用晚餐，同样，步子也得快，因为晚饭后，你得赶赴图书馆抢占坐位，那里经常人满为患，去迟了是没有位子坐的。每天晚上十时，你就得从图书馆打道回宿舍，只有半小时给你洗漱，十时半就得息灯就寝，你必须争取有一夜沉沉的睡眠，因为明朝等待着你的又是同样分秒必争的一天。

就像上足了发条的时钟，每天都以如此紧张的节奏运行，永不停歇，节假日基本上也是如此，只是节奏稍为舒缓一点。寒暑假也很少有人回家乡探亲，更没有“痛快玩一玩”或“旅游度假”之说，大家要利用假期大好的时光好好复习功课或者“自我加餐恶补”……这就是我们在北大四年的学习生活，如此在专业文化高坡上奋进，怎么会不成材不成器呢？从日后的发展来看，我们这个年级的确人才济济，各种岗位上挑大梁的业务骨干比比皆是。在我所比较熟悉的几届同学中，就有执掌《世界文学》主编一职多年的金志平与余中先，主持

《中国文学》编译的罗新璋，在马恩列斯编译局主译法文的施康强，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主持法国文学翻译的夏玟，在各名牌大学成为主力教授并在译述方面卓有业绩的桂裕芳、王文蓉、程曾厚、李玉民、袁树仁等等。

### “附庸风雅” 爱上古典音乐

西语系的专业教学使我得以被塑造成一个学术文化人才，而燕园里丰富多彩的文化氛围则有力地烘托、辅助、补充了这种塑造。

北大不愧是人文汇集的名校，校园里的学术文化活动极其丰富，或者说，这里几乎所有的活动都带有学术文化色彩，即使是举行时事政治性的报告会，那请来讲演的人竟也是带有浓重文化色彩的人物，如诗人元帅陈毅，才子型外交部长乔冠华，如果有什么外交的接待欢迎任务，那对象也必定是文化名人，特别是西语系更是如此。

为燕园文化学术氛围大增声色的还有学生的社团活动。这里有各种各样的社团：剧艺社、京剧社、诗社、国乐社、文学社以及唱片欣赏会等。每近周末，大饭厅与大礼堂附近的墙上及布告牌上，都贴满了各类社团活动的海报。参加方式有两种，一种是社团的正式成员，

他们都是活动的主持者、组织者与演出者，这些成员一般都是同学中的“才子”，每个人都有一两手“绝活”。就我熟知的班级而言，如德文专业的赵蓉恒，他不仅学德语的禀赋很高，有过目不忘的本领，而且拉得一手非常漂亮的二胡；又如后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领域取得骄人成就的叶秀山，在北大时就很多才多艺，是京剧社里的一个成员。

另一种参加方式，只是作为受众与观众，不经常不固定，就像觅食的小鸟，哪里有可口的食物就在哪里停下。我自知没有特别的天禀才情与还堪露一两手的技艺，不敢正式参加任何一个社团，但我自知底蕴浅薄，急需食补，于是，我在各种社团活动面前就像渴水的海绵一样，尽可能地多方吸取、兼容并蓄，往往在琳琅满目的社团海报面前，我常常有分身乏术的苦恼：我参加过诗社的活动，去听过田间的演讲，去集体拜见过卞之琳……而我去得更多也更受益的则是音乐欣赏会的活动。这是一个以俄罗斯语言文学系的青年师生为骨干的社团，几乎每周都举行活动，除了听唱片外，还有背景知识介绍以及技法欣赏讲解。我之所以对这个社团的活动特别感兴趣，首先当然是这些欧洲古典音乐本身十分有魅力，一接触就会如痴如醉地

爱上它，其次则因为古典音乐与西欧古典文学关系密切，我作为一个西方语言文学系的学生岂能对西方古典音乐无知无觉？正是从这里开始，我知道了从巴赫、莫扎特、贝多芬、肖邦、舒曼、门德尔松、施特劳斯直到柴科夫斯基、李莫斯、德沃夏克等这些大师的名字并开始有了相关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我总算对西方古典音乐中的那些鸿篇巨制以及优美名曲有了初步的认知与感受，这方面的社团活动对我来说真可谓是入门的辅导。

从此开始，我成为了一个对西方古典音乐附庸风雅的“粉丝”。“附庸风雅”并非妄自菲薄之语，我五音不全，乐理不通，全身绝无任何音乐细胞，也从来没有碰过任何一种乐器，哪怕在青年人中最为普遍流行的口琴，但我却自认为是西方古典音乐的爱好者、欣赏者、知音。不过，我的“附庸风雅”倒是下了“苦功夫”，我花了不少时间去吟记甚至背诵那些名曲中的著名乐段，至少是其中的主旋律。我开始是吟记那些短小的名曲，如舒伯特的《圣母颂》、圣桑的《天鹅》、舒曼的《小夜曲》、施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柴科夫斯基的《徐缓的歌》、卡门的《斗牛士之歌》等。能够自由自主吟记背诵这些名曲哪

怕是若干片断，那也是一种绝妙的自得其乐，能随着原版乐声而应和，那更是有种得意洋洋之感。不久，我又更进一步，吟记背诵起大型交响乐中著名的旋律乐段来。最初，我从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第二乐章开始，也就是树林中小溪流淌、雀儿啾啾、布谷鸟啼鸣的那一大段美不可言的音画诗。然后，又回到第一乐章久居城市之人外出踏青时的轻快与欣喜，再到第四乐章暴风雨之后天空的平和与宁静。

在北大期间，吟记背诵过多少古典名曲我实在是记不清了，而且此后数十年仍持之以恒。随着自己听音乐的条件改善了，逐步有了属于自己的起码的音响设备，吟记背诵的量也逐渐增加起来，到后来，我所吟记背诵的就有贝多芬的第五交响乐、第七交响乐、第八交响乐、第九交响乐以及舒伯特的《未完成交响乐》、德沃夏克的《新大陆交响乐》等。特别是贝多芬的《命运交响乐》更是陪伴着我岁月中一些坎坷的日子。德沃夏克的《新大陆交响乐》更是在我的生活中占据着特殊地位。我最初是喜爱它的清新与充满希望。后来，因为去美国的儿子特喜爱它，而对它有特殊的感情，如今儿子英年早逝，我只要一听《新大陆交响乐》这个名字，心里就一酸……

总而言之，我很庆幸在自己的吟记背诵库里有这么一份财富，它不存在什么实用功利的问题，我一生既没有就此写过音乐评论，也没有当众炫示卖弄，这只是一个自我感觉愉悦与精神享受的问题，自得其乐罢了。如果一定要说还有什么实际的影响，那便是这个习惯多少培养了我的一些艺术感受力以及对不同艺术形式的通感，而这对于一个文学评论者、文学研究者来说，是相当重要的。

总的来说，燕园四年，我充分利用了提供给我的学习条件，不论课内课外我都学得很努力，没有节假日，没有寒暑假，几乎每天都在往文化高地上奔跑，我做得往往比课程要求我的更多一点、更满一点。老师只要求写读书报告，我交上去的却是论文；王瑶老师并没有要求听他现代文学课的学生去通读《鲁迅全集》，但我却这样做了，至少读完了他的全部小说与杂文；翻译课老师并没有要求学生提前翻译文学作品，但我早就开始这样做了。

以我的智力灵敏度与身体条件而言，这么做是超出了我的负荷力与承受力的，久而久之，就“积劳成疾”，到了三年级终于爆发了一场严重的神经衰弱症，来势汹汹，令人恐惧，每夜只能

入睡个把小时，整天头晕脑胀，全身无力，根本无法应付日常的课程学习，眼见即将休学回家养病。但对于我这样一个靠助学金上大学的子弟来说，这条路对我而言无异是前途无望的绝路，这种“绝地求生”的处境使得我下定最大的决心，做出最大的努力来进行自救，中西药并用，扎针灸，加强体育锻炼，改变课程安排，减轻学习负担，学气功、练太极，更重要的是调整心态，变换心境，这一切我都做得一丝不苟，坚持不懈。经过将近一年坚韧而又得法的努力，我终于走出了危机与阴影，应付了正常的课程要求，恢复了健康，到了四年级，成为一个合格的好学生而顺利毕业，走上了工作岗位。大学四年对我来说是刻骨铭心的，从这一段经历中，我得出了根据情势及时调整自己的心态与行为方式的经验，这成为了我后来数十年的一笔精神财富。如果说我这一辈子所作的一些事情来自我的勤奋的话，那么，我能有所成的一个原因还在于我能调整自我、走出危机。

来源：微信公号 北京大学

编辑：张帆

## ■ 大美北大

燕园盛夏





来源：北大新闻网

编辑：丁香耳朵

## 学员心声

### 学习有感

我很荣幸能参加本次的国培幼儿教师网上培训学习。作为一名中青幼儿教师,我深深的感受到了国家对学前教育的重视,使我们倍感身为幼儿教师的光荣与神圣。通过这几个月的培训学习,我从中学习到了很多知识,使我对幼儿教育观念有了更多新的认识。知道了很多的先进的教学理念,本次培训给我许多思考,深刻的体会到自己要怎样成为一名受欢迎的幼儿教师?怎样才能幼儿教育过程中给幼儿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建立平等、民主、信任的新型师生关系?怎样提升自己的信息技术水平?怎样在教学中更好的应用好信息技术?怎样把理论知识转换为行为?.....我认为需要解决的问题还很多,一定要努力去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当然还需要自己不断的积累,不断的去学习。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学习,我认真反思了以往工作中的不足,使我的教育教学观念进一步得到更新,

真是受益匪浅。下面是我通过培训获得的体会:

这次国培学习我学到了很多。通过第二阶段的学习,专家的理论讲解、与我们的交流答疑、老师们之间的相互学习交流。使我在教学中得到了许多帮助。这次学习跨时间长,内容丰富,每个阶段的学习任务安排清楚具体。我时常利用平时的大空小闲在网上与老师们进行交流研讨。在教学中有什么问题我也会拿出来与大家交流,大家有的从理论方面提供建议,有的结合实际教学经验摆事实,还有的搜集资料给我。非常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胡老师是我们73教研组的组长,她工作认真负责,只要我在学习中有什么疑问,无论什么时候发信息给她,她都会第一时间回复我,这让我很感动。胡老师也许每天要回成百上千个问题,但每次她都能认真及时的回复。谢谢胡老师的帮助。这次的

学习让我感受到了互助互爱，感动无处不在。

幼儿园真正要给孩子的是良好的行为习惯，良好的规则意识，良好的成长状态。让他们成为身体健康、性格阳光、受人欢迎的人；成为坚强勇敢、自我节制、自我管理的人；成为能保持持续的学习兴趣，养成好习惯的人。让幼儿在一日活动中学习，在游戏中学习，正如杜威所说的：“教育即生活”。我园的养成教育为我们在这个问题的交流中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很多老师通过我们所总结的经验开始尝试幼儿园养成教育。

在与老师们讨论幼儿一日活动中我学到了：在教学过程中我们要关注幼儿的能力、需要、发展规律、学习特点等，即先备儿童再备教材，还要提出富有挑战性的任务。课程内容的选择要遵循目标性、生活性、趣味性、科学性、与周围环境一致性、直接经验性、逻辑性的原则。内容要跟着目标走，过程要跟着内容走提问、操作等要来自于内容。此外，我们还要把区角活动有效地开展起来，重视幼儿园环境的创设，提供多样性、复杂性

的区角游戏材料，提供高灵活性的材料，让幼儿有多种玩法，真正发挥幼儿园环境的教育作用。

通过这一段时间的国培学习，让我收获了快乐，收获了知识，收获了希望。让我明白了教师的专业成长需要经过积累、学习、反思、研究、沟通等几个过程。在这些过程中，要不断积累、总结经验教训，用先进的教育理念反思自己的教育教学过程，同时更需要具有研究幼儿、研究教学、研究环境、研究家长的能力和设计教学的能力等，这样才能成为一名最有智慧的老师。培训结束了，作为一名教师，此次培训中我深刻认识到，在新的时代和新的教育背景下，只有进一步更新教育观念，改进教学方法、教学行为和教学手段，扩大知识面，完善知识结构，从实践中学习，在反思中进步，提高专业化水平才是我们成长的途径和最大的收获。

河北省临漳县第四幼儿园

陈义敏